

中文摘要

日人佐伯好郎是景教研究专家，在景教研究界享有极高的荣誉，毕生研究景教的他，晚年还自称“景道”。佐伯好郎以后的景教研究界，有人赞赏他的观点，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人能漠视他的存在。

第一章从佐伯好郎的生平当中论述他走向景教学者的足迹。彰显知识装备的重要性。

第二章论述佐伯好郎的景教研究，其研究之详尽、涉及面之广、所运用材料之多，都是无人能及的。他将基督教发源到景教思想的源泉、景教的产生、意义、本质、景教变迁的历史、景教盛衰兴亡的过程一一展现给了读者。笔者希望结合佐伯的研究，找出景教在中国最终消亡的原因，同时找出佐伯景教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第三章简单论述佐伯好郎在景教研究上所做的贡献。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联系东西方的桥梁，在景教研究领域，佐伯好郎成了联系中国与西方景教研究的桥梁，优秀地完成了媒介的作用。精通中英文的佐伯把中文的景教经典全部英译，对不会中文的欧美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结束语总结佐伯之所以能在景教学界取得巨大成就的原由，强调知识装备的重要性。总结《景教碑文研究》，《景教之研究》中佐伯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关键词：

佐伯好郎 景教研究 研究贡献 《景教碑文研究》 《景教之研究》

日本語摘要

日本人佐伯好郎は景教専門家として景教学界で名誉を持っている。生涯を景教研究に尽くした氏は晩年に自ら“景道”という名をつけた。佐伯氏の後景教を研究している学者の中で、氏に賛成する人、反対する人はそれぞれだが、一つ確定できることは誰一人氏を無視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第一章では佐伯好郎の生涯から氏の景教研究の道を論述する。次に景教学者としての知識基礎の重要性を論述する。

第二章では詳しく佐伯氏の景教研究について論述する。研究範囲の広さ、研究の詳しさ、使用した材料の広さなどで佐伯氏に及ぶことが出来る人はいない。キリスト教の発生から景教思想の源流、景教の発生、意義、本質、景教変遷の歴史、景教盛衰興亡の足跡などを読者に広めている。筆者は佐伯氏の研究を元にして景教が最終的に中国で失敗した原因と佐伯好郎の景教研究方法と特徴を発見するのに専念するつもりである。

第三章では簡単に佐伯好郎景教研究上の功績について論述する。明治維新以来日本は長い間中国と西洋を繋げる仲介国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それと同じく佐伯氏は自分の研究だけではなく、すばらしい言語知識を武器に景教研究上中国と西洋の学界を繋げる仲介人の役割も優秀に果たした。特に中国の景教文献を英訳して、中国語ができない西洋学者の役に立った。

結論では佐伯氏の生涯から氏の景教研究をなせる知識装備の重要性と景教研究の研究方法をまとめる。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李银子 日期：2007. 5. 22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李银子 导师签名：马景全 日期：2007. 5. 22

绪论

自从明天启年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府出土以来，景教研究勾起了中西方学者极大的兴趣，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景教，作为天主教的一派，在唐贞观九年由阿罗本率使团来到长安，曾盛极一时，其兴盛、后来的衰弱、消亡，在中西宗教关系的比较研究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在景教研究上，除了当事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外，日本学者在此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当学界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真伪众说纷纭时，是日本的梵文专家高楠顺次郎经查阅《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发现了与般若法师共译《六波罗蜜多经》的“大秦寺僧景净”，打破了僵局，此后又有一批学者不断发现一些新材料，到如今，已无人能怀疑其真实性了。高楠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

但是，若要谈景教研究在日本的集大成者还是佐伯好郎先生。自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发表《景教碑文研究》以来，一直到昭和四十年（1965年）去世，佐伯好郎一直致力于中国景教、基督教的研究。一生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 13 本。自称“景道”，成为日本景教研究的最高峰、世界景教研究的权威。

在国内，笔者至今未见有人专门研究佐伯好郎，虽然他的著作被大量引用、借鉴，也无人对其专著进行过全方位的研究。

在日本，佐伯死后不久便成立了佐伯好郎传记刊行会，着手《佐伯好郎遗稿并传》的准备工作。死后第五年的 1970 年由法本义弘主编的共 1785 页的《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下）就得以出版。此后，1996 年，作为日本传记丛书第 222 号再版。

这本书，与一般的传记丛书不尽相同。主要由佐伯生前与其有交往之人的回忆文、佐伯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佐伯的一些杂文、报刊杂志关于佐伯的报道组成。是日本佐伯研究最全面的、甚至是唯一的材料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里还载有佐伯未完成的自传，虽不完整，但研究佐伯生平，没有能胜过此材料的。本文的第一章佐伯好郎的生平研究就主

要参照此书。

佐伯是怎样走向景教研究道路的？他是怎样成为景教研究的集大成者的？他的论著里主要论述了哪些内容？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点？这些是笔者在本文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位在景教研究方面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的研究，探究佐伯好郎之所以能成为知名景教学者的原因，对佐伯好郎其人其著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视野来论述佐伯好郎与他的景教研究，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法探讨佐伯好郎所受中国与西方的影响；景教研究，对学者的要求极高，要求具备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宗教学知识，本文将运用比较文学知识装备理论论述他是怎样具备这些知识装备的；论述景教研究中佐伯在中西方之间发挥的媒介作用；景教传习到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它本身在中国所受的影响；衰亡中体现出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吸收。

由于资料收集方面存在巨大难度，仅靠笔者手中的一些日文原著进行研究，故难免一些遗漏与不足。

本人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用中文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此中文表述难免有诸多错讹，敬请老师批评指正。

第一章 佐伯好郎的生平

佐伯好郎生于 1871 年歿于 1965 年，享年九十四岁，是学者中难得的长寿之人。这也给论述他的生平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因此，本文就将佐伯好郎的生涯分成几个阶段，对他人生中的一些大事进行论述。

第一节 上京求学之前

1871 年佐伯好郎作为长子出生在广岛县佐伯郡廿日市的佐伯家。佐伯家三百年前就开始经营酒厂，是当地的大户，同时也是书香门第。祖父、父亲在当时都是少有的博学多才之士。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佐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在乡下，也使佐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881 年，日本颁布了国会开设诏书，当时佐伯就读小学五年级。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校长满田省三郎召集全体学生朗读诏书、并进行了演说。虽然只有 10 岁，但胸怀大志的佐伯还是深深地被感动，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成为“国会议员”，开始了政治家之梦。

自从听了满田校长的演说之后，佐伯怀抱着国会议员的梦想刻苦学习。在小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¹ 学校的老师、父母都对佐伯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在父母和学校的殷殷期盼下，佐伯小学毕业进入了佐伯汉文学校。在佐伯汉文学校的谷本节夫、广岛县士族奥董作门下学习英文，同时在广岛县士族金子琢章、寺田清十郎门下学习汉学。²

明治 14 年，天皇和大臣们 7 月到 8 月要巡视山口、广岛、冈山三县，途中在廿日市境内有一次短暂的休息。休息时需要服侍天皇的少年，经过严格的选拔，佐伯被选中。同年 3 月佐伯就每天进出郡长室，在寺田清十郎门下学习礼法直到 7 月末。³

8 月 1 日，廿日市最炎热的一天，天皇一行来了，且都穿着厚厚的大礼服。大礼服原则上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 182 页。(日)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 年 7 月版。

² . 同上。

³ . 同上。

是冬服。天皇一行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到达目的地后就马上命令佐伯给大家端来冰水。当时，广岛县是没有冰块的。这些冰块是为了给天皇降温，专门从横滨港运过来的。这是佐伯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冰块。当时最后一个离开廿日市的内阁书记官长（当时被称为大书记官）金井之恭先生赞扬了佐伯一番之后，就鼓励他到东京来求学，成为有用之人，还让他到东京的话，就到在四谷的金井家。山田显义也说了同样的话。¹

这些鼓励对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佐伯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年仅 14 岁的佐伯，有了奋发向上的无穷无尽的动力。当时佐伯就读于离廿日市不远的郡立佐伯汉文学校，郡内的青少年从各村涌上学校学习。虽说是小小的农村学校，但因有了校长兼教师竹本节 14 年来的默默奉献与耕耘，还是有了一些可喜的发展。当得知佐伯要去东京求学的决心，一向很保守的校长却热情地鼓励他去东京。尽管有校长的鼓励，但佐伯的东京求学之路并不平坦，甚至是充满了艰辛。这主要来自当时还很顽固的日本的家族制度。

日本的明治时代，长子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佐伯这般立志要离开家乡求学，将祖传的产业抛掷一边是极其不孝之事。日本的明治时代，长子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的。佐伯家是当地有名的酿酒商，酿酒的家里出生的长子就要成为酿酒之人，这就是当时的“孝道”精神。改变祖先的宗教宗门、废止祖先传过来的祖业都是不孝的表现。因为长子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到明治 18 年（1885 年）为止长子还是免兵役的。²

作为佐伯家的长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继承祖传的酿酒产业就是佐伯好郎的命运。佐伯的父母也是以这个为目标对佐伯进行了教育。因此，佐伯学会了酿酒产业所需要的一切技能，做好了不管父亲何时撒手人寰都能顺利接手这份产业的准备。尽管这样，到 1887 年，佐伯还是下定决心要冲破家族制度的枷锁，上京求学了。

从 1885 年起有很多人鼓励佐伯上京求学，佐伯的挚友正木义太当时已去东京，不停地催促他上京，到 1887 年佐伯的上京热已达到顶点。于是，佐伯就写了一份“东京求学的必要”的文章呈给了父亲。信中有“东京是帝王之都，在东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天下大事。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 183 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 年 7 月版。

² . 同上，第 185 页。

而且我要立志于从事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方面的研究在东京以外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1890年要召开的国会正等待着我们。更何况，父亲明知金井先生、山田先生鼓励我上京求学，不是也没有表示反对吗？”¹

无论是从当时佐伯家的财力、还是从社会地位上考虑，佐伯的父亲都没有理由反对佐伯上京。佐伯的父亲就曾在江户逗留过，就是佐伯的爷爷，也曾在长崎逗留过数月。佐伯的父亲对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这些经历一直都引以为豪。若佐伯不是长子，佐伯的父亲早就应该让他上京求学、进大学预备班，最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可是长子的身份，成了非常大的障碍。不仅如此，佐伯的母亲和母亲的兄弟四人都坚决反对佐伯上京，佐伯的外公家是木材商人，当时是郡内数得着的富人，佐伯的外婆因为太疼爱孙子了，不想让他离开家乡，就极力怂恿其母亲反对佐伯上京。

无奈，佐伯就恳求比他大四岁的、在学校当助教的金子靖吉代他承担全部工作。金子靖吉非常赞同佐伯的决定，就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了。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终于得到了上京的许可。但这许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限为三年。准备上京行囊时，佐伯外婆家的人还把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也都塞进去，弄成了大包小包总共九个包裹。这并不只是因为疼爱佐伯。从廿日市到东京，路途遥远，当时的交通也非常不便，需要换乘好几趟轮船才能到达东京。佐伯外婆家的人异想天开地认为，从未出过远门的16岁佐伯拿着这么多行李，肯定会受不了旅途的艰辛而返回家。但父亲家的人真心支持他的决定，还给他雇来了四个使唤的人，告诉他在旅途上要注意的事项。²

就这样佐伯离开了家乡。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186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² . 同上，第187页。

第二节 上京求学之路

1887年8月末，佐伯一行背着很多行李出发了。先从廿日市出发，步行到广岛，在广岛坐划桨船到宇品港，在宇品港生平第一次乘坐蒸气船到达神户，再从神户坐山城丸的船驶向横滨，在横滨上陆后第一次乘坐电车赶往东京。当时横滨到东京的电车车票是25钱，而白米一升的价钱为5钱，可以想像当时电车车票之贵。横滨到东京只用两个小时就到了，这让第一次出远门的佐伯感到非常惊奇。佐伯村子里的老人们说“坐上电车，路旁的电线柱子看起来会像格子一样”，可稍稍让他失望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神奇。电车的速度快是快，可远没有达到老人们所描述的程度。晚上10点佐伯一行到达了东京的新桥站，叫了三辆人力车把行李装上，前往佐伯要下榻的宿舍一牛込区早稻田町十九番地名叫小川的地方。这个宿舍当时住着后来成为名古屋检察院检察长的长谷川定，还有以小说《国民之友》享誉全日本的、从九州来的宫崎八重吉（湖处子）。这里的生活给佐伯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离开家乡上京时佐伯的父亲答应提供他三年的学费，但佐伯也清楚地知道母亲一家的反对态度，在宇品港坐上蒸汽船的一刻起就在内心深处喊“男子立志出乡贯，学若不成死不还。人间到处有青山，埋骨岂期坟墓地”¹，已经做好了一辈子不回故里的心里准备。到了东京，就想着自立的方法。1887年，对佐伯来说，最好的自立方法就是拿下英文，可以一边阅读法律经济方面的原著，另一边到英语私塾当教师。可当时早稻田地方很偏僻，根本就没有英语私塾，无奈，佐伯就搬到了挚友正木义太所在的繁华区，与正木义太成了室友。这样佐伯就从早稻田的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转学到英吉利法律学校（中央大学的前身），刻苦学习法律和英语。因为家里寄过来的学费有限，英语只好靠自学。以这个为契机，佐伯研究起了英语自学的方法。这时期佐伯所总结出来的自学方法，12年后以“英语自学上的注意点”的题目发表在内村鉴三的《独立杂志》上，得到内村氏的高度评价。1899年4月，内村鉴三在《独立杂志》上写道“友人佐伯氏是我国少有的优秀英语学者，他深知计划性、条理

¹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189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性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这次很荣幸得以发表佐伯氏关于英语自学的文章，深表感谢。”¹ 佐伯在英文方面的造诣此时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说起英吉利法律学校，离不开增岛六一郎。增岛六一郎对佐伯、甚至对当时的整个日本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87 年左右，正是日本国民性高涨的时期，恰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震惊全日本的英国商船诺曼顿事件。1886 年英国商船诺曼顿在神户载着 19 名日本乘客驶往横滨，途中，船触礁沉没。危难关头，欧美籍乘客全部坐上救生艇而获救，而日本籍乘客却无一人能坐上救生艇，全部遇难。此消息一经报纸披露，立即引起日本人强烈的愤慨。可当时的法律对拥有治外法权的英国人船长却束手无策。正在人们不知所措之时，增岛六一郎出现了。增岛 1878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法律专业，后去英国留学，获得英国高级律师资格。1882 年回国，在东京、横滨开有律师事务所。增岛以自己英国高级律师的身份，根据英国法律将船长告到了横滨的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以增岛律师的申述为根据，将船长投进了横滨的监狱。在判决还没有确定下来之时，船长就在狱中病死，这一事件也告一段落了。²

日本国民对增岛由衷地表示了感谢。增岛在横滨地方法院院长冈村辉彦（英国律师）、日本律师代表冈山兼吉等人的协助下扩建了英吉利法律学校。佐伯也对增岛充满了敬佩之心，开始对法律学产生兴趣。佐伯的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是景教研究，但他对法律学的造诣也是颇让人敬佩的。如佐伯在 1922 年被任命为明治大学法学部讲师，讲授罗马法，还出版了《罗马法纲要》，《罗马法学思想对基督教成立的影响》。

1887 年、1888 年，佐伯的父亲按期给他寄过来学费、生活费。可到后来，就连佐伯的父亲也屈服于佐伯母亲一方的压力而改变了初衷，想让佐伯回家，佐伯没有同意。因为违背了佐伯父亲的意愿，佐伯的父亲就切断了他的学费、生活费。这样，佐伯不得不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于是，他就开始在四谷附近的一家名叫“作文馆”的私塾当上了英语教师。一个月大概有 6 日元的收入。当时学生只要有 5 日元到 7 日元钱就差不多能在东京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了。这一时期，佐伯的好友金子靖吉在佐伯父亲的要求下特意来东京，了解他的生活情况。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 190 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 年 7 月。

² . 同上，第 191 页。

没过多久，佐伯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对于他已在经济上独立，父亲已无话可说，所以就拿他当初跟父亲的约定来质问三年之内完成学业是不是成了一句空话，说当初把佐伯送到东京，是为了让他学到法政知识而回到廿日市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到父亲的来信佐伯发誓一定在1890年7月以前拿到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的毕业证书，同时与金子靖吉约定了1890年8月与其解除合约。¹

当时佐伯已经做好了从政的打算。正好此时家乡佐伯郡出身的八田谨二郎领着表弟小田甲子郎来到了东京。八田氏当时是贵族院议员候补。佐伯急忙去神田的旅馆拜见八田，跟他谈天下的形势，劝他参选贵族院议员，还提到明年自己正好可以从东京专门学校毕业，请求八田聘自己为秘书。八田氏痛快地答应了，并嘱咐佐伯好好研究宪法和议院法。

为了拿到东京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佐伯向学校缴纳了多达16日元的学费。这是因为只有缴纳三年的学费（即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才能获得三年级入籍考试资格。1890年2月12日入籍考试开始了。遗憾的是，佐伯在英吉利法律学校一年级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253名学生当中名列第三）不被东京专门学校的入籍考试所承认。无奈之下，佐伯接受了一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的入籍考试，考试成绩之优使学校一方大为惊奇。接下来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入籍考试顺利通过，进入了三年级上学期。若三年级上学期入籍考试通过，1890年4月1日就能进入三年级下学期。最终，三年级下学期的考试也能顺利通过，佐伯就能履行自己的誓言，东京专门学校毕业了。成败的关键是1890年3月下旬的三年级入学考试。佐伯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没日没夜地学习。当时佐伯下榻的学生宿舍旁边住着石川县出身的稻垣伏太郎。稻垣比佐伯年长几岁，是个热心人。负责东京专门学校二年级学生的生活。他看到佐伯1890年正月来到宿舍以来就每天起早贪黑地学习，非常同情，佐伯的成绩都是他第一个从学校当局那里得到消息后通知的。看到佐伯疲惫不堪的样子，稻垣还拿生鸡蛋来给佐伯吃，使其补充一些营养。终于到了考试的日子，3月21日、22日的考试都顺利进行了。可是因为连日来的劳累过度，22日下午开始佐伯就突然发高烧到40度，23日已经卧床不起了。正当佐

¹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198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伯束手无策时，住在旁边的稻原得知情况后马上将佐伯背到了早稻田的考场，把佐伯放在教室的椅子上，自己到考场外面等着。虽然身体非常虚弱，佐伯还是圆满地结束了考试，然后在稻垣的帮助下回到宿舍接受了医生的诊断，过了两周在病床上呻吟的日子。卧病在床期间，稻垣将三年级下学期入学许可的消息告诉了佐伯。

那一届，东京专门学校得到三年级下学期入学许可的总共有两个，法科是佐伯，政法科是田川大吉郎。战胜种种艰辛，佐伯终于从东京专门学校毕业了，将毕业证书和与大隈重信（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创建人）夫妻、东京专门学校教师的合影寄去了家乡。圆满地履行了与父亲的约定。

第三节 退出政界赴美留学

1890年7月，东京专门学校司法科毕业以后，佐伯当上了八田的秘书，开始辅佐八田。八田贵族院议员选举失败以后，佐伯就辅佐他当上了众议院议员。1890年10月，作为八田氏的秘书与八田一起上京。在八田氏不在的情况下负责全部事务。因为这一特殊身份，当时只有19岁的佐伯，时常受到当时政界大人物的邀请而出入一些东京的高档场所。得到如此高的待遇，佐伯认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自己掌管着八田氏的财政，这些政界大人物也都是一些贪图八田财产之人。初入政界遇到的这些事情，对从小就对国会充满憧憬的19岁少年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当时佐伯正好读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传记，书中俾斯麦给出成为政治家的三大要件，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¹佐伯看到当时所谓政治家的肮脏嘴脸，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政界的权钱交易关系，对政治越来越厌恶。1881年开始怀抱着的政治家迷梦就这样破灭了。梦想破灭以后，佐伯与八田告别，为八田着想，也让他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务。

辞去八田的秘书职务以后，1891年9月到第二年1月的五个月时间，在英国人J·威廉以及H·哈密尔顿博士、理学士鲍尔门下学习英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的基础。退出政界以后，佐伯对自己的前程烦闷了很久，最后决定赴美留学，下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

1893年，佐伯22岁，这一年的4月25日，佐伯只身一人在横滨港乘上驶往美国的轮船。同年9月，进入北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私立学校，学习历史、希腊语、拉丁语，在语言学习上，佐伯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尤其在希腊语的学习中表现突出，平均得到97分，得以免交六个月的学费。²1894年7月佐伯来到密歇根，学习雄辩法、希伯来语基础。1894年6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市学习英语的博言学研究，1896年回国。佐伯一共在美国、加拿大生活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英语和西洋古典语的研究。这一段留学生活，为佐伯以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203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² . 同上，第7页。

后从事景教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除了英语以外，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都是景教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知识装备。

第四节 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回国后的 1897 年 4 月佐伯成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英文教师。高等师范学校创立于 1886 年，1906 年改名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佐伯第一次踏入高等师范学校，是在 1887 年 10 月。说起佐伯踏入高等师范学校的原由，那就比较复杂了。当时佐伯刚来东京不久，小学时教过佐伯的太田义弼老师 35 岁时通过刻苦努力考上了高等师范学校。佐伯从家书中得知此消息，对太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遂前往老师的宿舍拜访了他。当年太田老师在宿舍里对佐伯的殷殷教诲佐伯一直铭记在心。太田老师的事迹使佐伯深深地懂得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佐伯到古稀之年依然保持高昂的研究劲头，与太田老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那以后正好过去十年，佐伯第二次踏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当年他 26 岁，刚从美国回到日本。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理学博士矢田部良吉的引荐，佐伯成了高等师范学校的英语老师。

佐伯与矢田部先生的关系也是颇有渊源的。当佐伯在东京专门学校教授英语时，有几次，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来听课。当时佐伯并不知道这位就是在英语学界赫赫有名的矢田部先生，只以为他是一个仰慕大隈重信（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的一般人。也就一如既往按自己的风格上课。

当佐伯受聘为高等师范学校教师时，矢田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校的英语教师了。我之所以从众多候补者中选择了你，并不是因为你很了不起。而是看到了你的发展前景。你很年轻，发音正确，说话的感觉也很好。在我校，有我们这些老教师给你一些指点，相信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所以，我才选择了你。你绝对不能自我陶醉，一定要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¹

在英语教学中，矢田部先生要求佐伯做到以下几点：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 209、210 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 年 7 月。

熟读课文、认真研究课文。要正确读出、正确理解教科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事件、动植物、机器等。要不厌其烦地查阅辞典。对教科书中出现的名词进行如下讲解。1、给学生看实物。2、没有实物的出示标本或照片。3、在信得过的辞典上查找单词。4、食物要自己亲自品尝味道，要能够说出各种相似食物的区别。5、给两个班级讲授同样的内容的情况下，在第二课堂一定要察觉出第一课堂所欠缺的或失误的地方。若没有察觉，那这次课堂实际就是失败了。¹

矢田部在英语教学上提出的这些要求，让刚刚参加工作、难免有点浮躁的佐伯深刻地明白了教学需要扎扎实实下功夫，要掌握切实的材料、证据；要不断地发现缺陷、不足，努力进行改善；比较不能流于肤浅，要比较出实质的异同。在以后的景教研究上，佐伯就这样要求自己，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佐伯从内心深处敬佩矢田部，按照他的要求积极努力。矢田部经常邀请自己的毕业生和佐伯到家里喝茶聊天。矢田部的卧室里赫然挂着“少年易老学成难”的横幅，从这里也可窥见他的人品。

矢田部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明治初年，森有礼担任美国公使时派外山正一博士与矢田部博士到美国留学。外山博士在密西根大学专修哲学，矢田部博士在康奈尔大学专修植物学，回国后当上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遗憾的是，当时的帝国大学正值派系斗争的最盛期，具有平民气质的矢田部博士被反对派挤出了东京帝国大学。所幸的是在后辈嘉纳先生的侠义援助下当上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务长、同时兼任上野音乐学校校长。若说起矢田部最大的成就，当首推他对日本英语教育的贡献。矢田部作为文部省英语教员鉴定考试委员长对日本英语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1899年夏，矢田部在镰仓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失去了矢田部，佐伯感觉如同丢失了罗盘针的小舟一样找不到方向了。这也成为佐伯最终离开高等师范学校，从事景教研究的一个契机。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210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佐伯最终下定决心离开高等师范学校是在1904年,其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佐伯开始了自我批判,虽承蒙矢田部先生的厚爱,却还是逐渐感觉到语言教师前途之渺茫。在这样的心态中又正好读到歌德的《浮士德》,里面的这样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佐伯。“Nicht wie du sagen, ober was du sagen!”¹,知道了不管用多么华丽的词藻来修饰,若没有深刻的思想,语言只能是空架子的道理。深刻体会到应该追求思想、内容,而语言只是追求思想、内容的工具。从那以后,佐伯苦学十年,走向刻苦钻研学问的道路,所掌握的英语、还有其他一些外国语言都成为了研究学问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一段时期,是佐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¹. 转引自《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213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第五节 从事景教研究

佐伯留意起景教，是从他决定离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1904年开始的。佐伯在其未完成的自传中提到“1904年我研究欧亚大陆交通，以便阐明东西文化关系的过程中，特别留意起了景教传入中国的问题。”¹

1907年，36岁的佐伯在《地理历史》杂志上发表了“拂菻考”。这是他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最初尝试。从此，景教研究一直伴随佐伯走到生命的尽头。

当时，日本人研究景教者寥寥无几。虽说日本学者擅长中文，但作为研究资料而能在中国找得到的文献屈指可数，基本上要依赖碑文和古抄本，而那些文献被翻译成外国古典语的居多。这些客观因素导致景教研究对学者的要求极高，不仅要具备基督教知识还要具备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等古典语的素养，且在当时，残存的景教经典基本处于根本无法读懂的境地。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派，很多资料文献都是用西洋文写成，这就要求学者能够自由阅读外国文献资料，光靠汉学知识无法进行研究的。对于本来就不是汉学者的佐伯来说其艰辛可想而知。他在《景教之研究》自序当中就写道：“幼时所学汉文汉字知识在英语还有其他外国语的学习中到了几乎被遗忘的程度，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不得不直面中国古代的拓本、抄本。加上，以往在外国学过的拉丁语、希腊语在时间的流逝中也已生锈，无法派上用场。欧洲人的汉学研究，在十七八世纪以前都是用拉丁语发表的。若要读懂这些材料，就必须懂拉丁语。”

2

1907年到1908年，佐伯前往中国，还有英国等欧洲各国，搜集研究资料。在这期间，拜见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及王妃，出入王室家庭，得到王室的信赖，在拜见时也有一些趣闻。面对礼节异常严格的英王室，佐伯为了不至于在着装方面有什么失礼之处，特意打电话过去问应配戴的手套的颜色，却将对方所说的“除了白色的，先生”（Anything but white, sir）听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第213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² . 《景教の研究》，第3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年6月第三版。

成了“除非是白色的，先生”(Nothing but white, sir)，精通英文的佐伯之所以有这样的失误，是由于手套应为白色的思维定式造成的。就这样，佐伯戴上了白色手套。进入休息室惊出了一身冷汗，拜见者中戴着白色手套者竟无一人。虽领悟到了自己的失误，但为时已晚。当时的佐伯就想到其他人都是英属国民，而自己却是与其对等的日本国民，在这样的想法下，到他拜见英王的时候，并没有行跪礼，而是从容不迫地握住了国王的手，陪同周围的英国侍臣、日本外交官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不愧是英国国王，以对等的礼节马上介绍起了站在旁边的王妃。在晚年，佐伯常以此例来说明思维定式的危害性。¹想当然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对的，凡事都要以事实为根据，做学问也是如此，只有在切实的材料和证据下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但从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佐伯是个遇事从容不迫、擅长临机应变之人。

佐伯景教研究中，最初出版的研究论著是解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景教碑文研究》(1911年)。第二年春，得到牛津大学教授塞思博士(A. H. Sayce)的鼓励，将英文本“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的原稿送至伦敦。可正逢欧洲大战的爆发，校正稿竟有两次都被德国潜艇击沉而丢失，直到1915年才得以出版。出书的出版，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很快就欧洲确立了佐伯好郎作为景教研究专家的声望。

1922年、1926年、1931年佐伯先后三次到中国游学，搜集材料。让人痛心的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之前所搜集材料的一半以上都遭焚烧。

佐伯得以专门从事景教研究是在1931年11月，61岁时作为景教专家受聘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现在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开始的。东方文化学院由外务省设立，设有东京、京都两个研究所，当时东京研究所的所长是服部宇之吉，东洋史有白鸟库吉、池田宏，哲学有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美术建筑有泷精一、伊东忠太等享誉国内外的博学之士，这样的环境，对学者们的相互启发是非常有利的。在东方文化学院期间，佐伯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景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景教之研究》及其英文本“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出版。因在景教研究上做出的杰出贡献，1941年获得了东京

¹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第205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当然，日本人的景教研究并不限于佐伯一人，1910年开始，东京帝国大学的桑原鹭藏，羽田亨，神田喜一郎都陆续发表了论文，但是搜集贯通东西之材料，致力于综合性研究，且将汉文景教文献资料全部英译的却只有佐伯一人。佐伯景教文献资料的英译本在西方学者中流传甚广，为不会中文的西方学者的景教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学术观点上难免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但不管怎样，都要高度评价佐伯对学界的贡献，在景教研究中，说开拓了前人未踏之领域亦非过言。在《景教之研究》之后佐伯又陆续出版了《支那基督教之研究》（一）（二）（三）三册，1943、1944年间写完续篇《清朝基督教研究》，1949年出版。此外，补译了 Wallis Budge Kt 博士的著作《元主忽必烈派往欧洲的景教僧的旅行志》，1959年88岁高龄在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上讲演了《景教在中国衰亡史》。

当然，佐伯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景教、中国基督教研究。1922年以来，佐伯在明治大学法学部讲演罗马法，书稿有《罗马法纲要》（1927年出版），晚年将旧稿整理成《罗马帝国基督教保护规定之研究》（昭和30年）。运用自己罗马法学的知识第一次论及罗马法律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佐伯学贯东西，掌握着以英语为中心的语言学基础；拥有法律学的造诣；19岁接受洗礼，成为圣公会教徒，作为天主教教徒对基督教教义有深刻的理解，这三个方面的知识装备使得其景教研究顺利进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享誉世界的景教研究专家。

1944年73岁的佐伯因战争缘故辞去明治大学教授职务，回到乡里当上了町长，此后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研究劲头。以“景道”自居，足可见他对景教研究的热爱。在担任町长时期被乡人亲切地称为“学者町长”。在担任町长期间还出版了《支那基督教研究》（3）（1944年），《清朝基督教研究》（1949年），此外，在各类杂志、学报上发表论文数篇，且不顾老迈，还到各地去进行讲演。

1962年11月，为纪念早稻田大学成立80周年，母校早稻田大学授予佐伯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佐伯的年岁，当局特意将学位授予仪式的会场定在离佐伯家乡较近的广岛市小町见真讲堂内。临终前的1965年4月29日被封为勋三等，授予瑞宝章。

佐伯好郎于1965年6月2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位景教学者忙碌而辉煌的人生闭幕了。

第二章 佐伯好郎的景教研究

从美国、加拿大留学归来以后的佐伯一直以英语教师的身份游走于各个学校，他在学术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1907年，36岁时在杂志《地理历史》上发表“拂菻考”，从此，他就与景教有了不解之缘。

第一节 景教碑文研究

佐伯好郎的《景教碑文研究》初版发行于1911年，笔者手中的1996年版的《景教碑文研究》不仅包括1911年版的《景教碑文研究》，作为参考文献，还收录有1932年佐伯私家版《景教文献及遗物目录》。

1996年版的《景教碑文研究》在大的方面包括景教碑文研究绪论、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略解、附录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共118页，由44个单位组成，第二部分共10页，第三部分共38页，附录部分共120页。

1911年发表的《景教碑文研究》是佐伯好郎的第一本景教研究论著，在佐伯的景教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其日文著作以外，佐伯利用自己深厚的外语功底，还将此书翻译成了英文，1916年得以出版。英文版中对景教碑文的译注，对一些不识中文的西方学者视作权威。被大量借鉴、引用。

佐伯好郎的景教研究从景教碑文开始，足可见他对景教碑的重视。景教引起世人的注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也是从景教碑的发现开始的。佐伯好郎就曾说过，“中国景教的研究，实从景教碑文之研究开始，又以碑文之研究告终，亦非过言”¹

¹ .《支那基督教研究》(一)，第181页，佐伯好郎著，转引自《中国景教》，第112页，朱谦之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5月。

一、中华文明的价值

在《景教碑文研究》中佐伯好郎高度评价了中华文明的价值。“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历史上来说中国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三皇五帝开始，经过汉唐盛世，长达三千多年间中华民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历史。中华民族将其文明之光传向四方，成为东亚文明之源流。其文明发展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欧洲文明之两大源流—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韩文公所说‘唐受天命为天子、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大小、咸臣顺于朝、时节贡水土百物、大者特来、小者附集’，不应把他只看作文人惯用的夸张手法，它确实诉说着历史的一面。唐代的长安并非只是中华帝国之长安，同时也是世界之长安。随着景教的传入，其宽广的胸怀接受、容纳了希腊文明。玄宗皇帝时代的长安可谓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伦敦，一言以蔽之，唐朝的长安是当时文明世界的缩写图。”¹

文明古国的标准并不在于面积的广狭、人口的众寡，而在于民族的优劣、国民文化程度的高低。中国，是佐伯最最推崇的文明古国。他在《景教碑文研究》中说到其原因。“不是因万里长城，而是因周公孔子；不是因长江黄河，而是因伯夷叔齐；不是因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而是因诸葛孔明；并不因中国与日本贸易之发达，而是因文天祥。中国之让人崇敬，比起其物质方面的辉煌，更在于其在精神思想领域所创造的辉煌。”²

二、景教传来中国的原因

景教之传来中国，是偶然的，但同时也是必然的。唐代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景教得以传过来的客观条件。首先在交通上，佐伯认为，早在日唐交通开通以前，欧洲文明古国与中国之间的陆路交通就已开通。从当时的中国所使用的外来语单词就可窥见一斑。根据日本文学博士大规文彦的考证，檀那、玻璃为传到中国来的梵语发音；根据德国有名的东洋学者 Hirth 教授，还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Giles 等的证明，“葡萄”、“西瓜”、“萝卜”等名词的发音是和它的实物一起从大秦地区传到中国来的希腊语的发音；“狮”、“安息”是模仿波斯语的发音；公元 8 世纪中国就已有希伯来语宗教词汇“沙弹”、“弥尸珂”或“弥施珂”了。

¹ . 《景教碑文研究》，第 1 页，佐伯好郎著，大空社，1996 年 9 月。

² . 同上，第 2 页。

那么，唐代脍炙人口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或“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又或“紫绿眼胡人吹”，并非出自诗人们丰富的想像力，是有其历史、语言学上的根据的。

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的时间为唐建中二年一月七日现异邦日祭日（Ephiphany）。关于景教碑发现的时间，佐伯采用了天启五年说。此说是当时比较有势力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佐伯虽然采用了通说，却言，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说的正确性是颇让人遗憾的。这就为他在后来的研究中主张天启三年说埋下了伏笔。关于景教碑埋没的时间，采用唐会昌五年，起因于武宗皇帝的废佛毁寺运动。

在佐伯撰写《景教碑文研究》时，景教碑的真实性已经得到验证，无人再持怀疑态度。关于景教碑之真实性，佐伯依据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从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两方面进行论证。其论述如下：

间接证据：①早在景教传来之前，中国与大秦之间的陆路交通已经开通。根据司马迁《史记》，早在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亚洲领土就已接壤。②中国历代帝王的诏书、金石文中找到的关于景教的事迹。如武宗皇帝废佛毁寺的诏书。③贝里奥教授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的景教文献《景教三威蒙度赞》以及《尊经》。

直接证据：①关于大秦寺僧景净的问题。高楠顺次郎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发现了关于景净的记事。②碑文中所写“大唐建中二年随在作恶大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经计算，大唐建中二年一月七日为公元七百八十一年，这一天，确为星期日。建碑之时，宁恕已去世两年，可见，因路途遥远，此时宁恕去世的消息还未传到中国，若为后世之伪造，也就不会犯如此显而易见的错误了。③“僧拂菻”问题。④一些人名的翻译与今时中国传统的翻译不尽相同，与敦煌石室文书也不尽相同。同样道理，若为后世之伪造，也就不会犯这些错误了。

在景教碑真伪的判断上，佐伯列举了欧美学者的态度，批判了主张景教碑伪造说的学者。说他们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对汉唐文明理解不够、不具备汉字汉文知识、且对基督教传教士比较反感，这些因素导致他们没能客观地、科学地看待景教碑。

其次，对景教碑出土国—中国的学者他也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对景教碑的冷淡态度让人惊异。中国学者鉴别文物真假的慧眼是他国学者不能望其项背的，可在景教碑问题上他们的表现颇令人失望。¹

四、关于景教

《景教碑文研究》还涉及了景教的起源、特色、变迁，景教与欧洲文明、与其他宗教（佛教、道教、儒教）的关系。

若要知景教，就首先要知道基督教正统派为何物。佐伯主张景教并非基督教之异端，是基督教的分派。聂斯托留派属于东西两教会之东方教会。基督教正统派有必须遵守的关于基督的四大原则：①基督是神（神性）。②基督是人（人性）。③基督是神人合一的一人格者。④在基督身上，神人两性圆满融合。聂斯托留以正统派最热心的勇士自居，他是这些原则的衷心守护者。聂斯托留只是反对当时盛行的玛利亚圣母说，而玛利亚圣母说没有任何一次宗教会议把它定为基督教教规。聂斯托留反对当时的流行学说，触怒了民众，再加上遭到西里录一派的猛烈攻击，最终被不公平地定为了异端。从此，景教从基督教正统派中分离出来，开始了被视为异端的命运。

在景教的特色这一方面，佐伯列举了十条。且一一与天主教和新教进行对比。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及的景教特色并非聂斯托留本人的主张，是后来景教演变发展中形成并成熟起来的特点。

- 1, 反对玛利亚圣母说。（与天主教相异之第一点）
- 2, 只用十字架，不用十字架以外的其他偶像。（与天主教相异之第二点）
- 3, 不承认死后涤罪说，但容许祭拜祖先。景教碑中有“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之语。（与天

¹ . 《景教碑文研究》，第 74 页，佐伯好郎著，大空社，1996 年 9 月。

主教相异之第三点)

- 4, 不承认圣餐式中的面包和葡萄酒经过教徒的祈祷变成耶稣的肉与血的化体说,但说圣餐式时基督会光临。(与天主教相异之第四点)
- 5, 教士共分八级。分法主、大德、僧、执事以及四种教会辅助者。(与天主教相异之第五点,与新教各派相异之第一点。天主教实行法主、大监督、监督(大德)、长老(僧)、执事五级制度;新教中的监督教会派实行监督、长老、执事三级制度,其他新教各派不承认监督者居多,还有一些连长老也不承认。)
- 6, 法主以下景教徒可婚娶。(与天主教相异之第六点)
- 7, 景教实行斋戒主义。(与新教各派相异之第二点)
- 8, 景教法主实行素食主义。(与天主教相异之第七点,与新教各派相异之第三点)
- 9, 法主由管长(掌管大德六人之人)三人之间互相选举而决定。(与天主教、新教各派大同小异)
- 10, 景教发源于叙利亚一带,宗教书籍多半采用叙利亚语,但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各地土语也不禁止。在中国的景教使用汉文进行礼拜。这从敦煌石室遗书中可知。(与天主教相异之第七点。罗马教廷一时只限使用拉丁语,东方教会一时只限使用希腊语)¹

从上述景教的特点佐伯总结出,景教在其教义上比起罗马教廷之天主教,更接近于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²

佐伯提出的这一观点,到后来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说。

五、景教的变迁

景教的变迁,经历了由叙利亚到波斯,再从波斯到印度、中国的过程。景教在变迁过程中,将希腊文化带到了阿拉伯,将西方文化的种子播向了波斯、印度、中国等地。景教在波斯曾得到波斯王的保护,后来又得到回教国的保护,唐代传到中国以后,也曾得到唐朝皇帝的保护,可到后来,经唐会昌五年武宗皇帝的废佛毁寺运动与元朝铁木尔景教徒虐杀事件以

¹. 《景教碑文研究》,第83页到86页,佐伯好郎著,大空社,1996年9月。

². 同上。

后，在中国渐渐失去了其踪影。佐伯认为在铁木尔的景教徒虐杀事件中一些景教徒转而成了与景教颇有渊源的回教徒。这就是现如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回教徒的原因所在。¹

景教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思想传到它所到之处。就算有人说景教所传播的西方文明之光微弱得很，但景教在医学、药物学上做出的功绩却是无人能漠视的。

景教所到之处，必定与当地的宗教发生联系、受到影响。景教到中国，就受到当时中国盛行的佛教、道教、还有儒教的影响。景教的命名与当时在长安颇盛行的“大日教”、还有道教经典“皇帝内外景经”有密切的关系，佐伯认为景教碑的书写者吕秀岩即为道教的吕祖、吕洞宾。景教到中国之后接受了儒家的祖先崇拜主义思想，这可从景教碑文中的关于祭祀祖先中得知。

景教失败的原因

景教在中国传教失败的原因，在本书中佐伯只简单举出了两点。①长安文明不容易接受、或者否定基督教根本教义之基督复活升天的教义。②景教的背后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柱的支撑²。佐伯 1911 年出版此书时，还处于景教研究的初级阶段，观点还不够全面、成熟。在下章要论述的《景教之研究》，对景教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分析就全面、成熟了许多。

景教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将自己的影响留在了中国。现在满族文字中存留景教文字的踪影；景教徒的后裔残存于中国几千万回教徒中；将祖先崇拜教义加进了中国佛教的特色当中；将其名称藏在大日教的名称之中；荤食娶妻主义被日本佛教真宗所接受。所有这些，都告诉人们景教曾经的存在、景教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持续着，九泉之下的景教徒也应感到欣慰才是。

第二节 《景教之研究》

佐伯好郎的《景教之研究》初版发行于 1935 年 1 月，笔者手中的为 1980 年 6 月的第三版。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 89 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 年 7 月。

²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 120 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 年 7 月。

《景教之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有 17 章、508 页，下篇有 4 章，486 页，除此之外，还有图版 17 个，插图 188 个，地图及表格 9 个，附录 133 页，最后还附有 16 页的索引。不愧为景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一、景教研究目的：

宗教是社会制度的一种，离开了人类无所谓神佛，离开了忠孝无所谓道德，同理，离开了人类社会，无所谓宗教、道德。西方的宗教、道德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是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基督教自从诞生以来在西方社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无视基督教、基督教会，就无法正确、全面认识西方社会。正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是发现、认识自我文化价值的第一步。研究基督教，有很多方法，其中对其异端史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景教研究的价值就在此。在所谓基督教异端中没有比景教更强有力的团体，也没有像景教这样充分体现基督教正统派本质的。

景教从属于东西两个基督教会之中的东方基督教会。蕴含浓厚希腊思想，拥有高超的医学、天文、算数等科学知识的，从属于安都城的进步宗教团体。公元 5 世纪传入波斯、6 世纪越过伊朗高原来到中国的西域，7 世纪前后已传到了万里长城内外。从 6 世纪到 14 世纪，长达 9 百年的时间里与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景教研究的目的由此产生。

第一，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上观察西方基督教本质。从而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经济制度。

第二，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比较中，“认识他者，重新认识自我。”

第三，以景教研究为出发点，从根本上研究西方精神文明之根本—基督教。从基督教与东方精神文明的对照中加深对东方文明之基础—儒释道的理解，实行东方文化再检讨。景教研究之使命就在此。¹

二、景教研究之范围：

¹ . 《景教の研究》，第 1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三版。

佐伯在此书中论述的景教研究内容、研究事项有以下几点

- 1、基督教之起源与发展，与基督教有关系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背景。
- 2、探讨东方基督教会以及西方基督教会的神学立场以及基督教的根本思想。
- 3、比较论述景教的基督论和攻击景教的反对党的基督论，明确基督教正统派教会对象教攻击的焦点。
- 4、概述景教的信条和教理。
- 5、论述景教长达 1500 年的变迁史。
- 6、找出景教流传的地域分布图。
- 7、使景教东渐与欧亚交通的关系一目了然。
- 8、研究景教文献。
- 9、论述景教传来中国上下 7 百年的盛衰史。
- 10、研究中国景教汉文经典以及叙利亚文等资料，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再认识景教本质。
- 11、中国境内外发现的景教遗迹遗物，从中观察景教在中国衰亡的原由。¹

《景教之研究》不愧为景教研究的集大成制之作，从景教产生的背景到当前景教的状况，除佐伯好郎之外，无人做过如此广泛、详细的研究。佐伯之所以能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是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且因他精通英语、汉语，同时还掌握着一些古典语基础，如拉丁语希腊语、叙利亚语。这些语言方面的优势，使得他能自由阅读、研究各种原始材料。

三、景教的意义、与基督教的关系

景教即基督教之一派—聂斯托留派，于唐贞观九年从波斯传到中国，当时叫波斯教或波斯经教，后来称“弥施珂教”或“迷师珂教”，最初其寺院称波斯寺，其僧侣称大秦僧，直到唐天宝年间此教正式定名为景教。这自命为景教的理由，佐伯好郎举出了四点理由：

- ① 当时弥施珂教徒称弥施珂是世之光，景字第一字义即光明之义。
- ② 景字通京，由日与京二字合成，而“京”有大之意。“鲸”之“京”意味着大鱼，“京

¹ . 《景教の研究》，第 12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三版。。

都”之“京”亦为大都，故景有大光明之义。

③ 当时，具有佛教密宗特征的“大日教”在长安颇有势力，景教为壮大自己的势力加以利用，“大日教”和“日大教”民众易于接受。

④ 于道教的关系，道教的主要经典有《皇帝内外景经》，这景经与景教相似，具有暗示作用。¹

从这四点可以看出，当时的景教徒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情形，试图依靠中国原由之宗教势力，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扎根中国。

说景教是基督教之一派或基督教之异端，那么，景教与基督教究竟有什么渊源呢？若要了解景教，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基督教本身。而要弄清基督教的本质，就要明白基督教和耶稣教并非一回事。所谓基督教，是“基督之教”、“教授基督的宗旨”，实际上是传授“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施珂”的宗教。换言之，就是主张犹太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尊称耶稣为基督的宗教。反之，耶稣教就是“耶稣之教”，是自然人耶稣在世时为拯救众生而说法的“福音”，这“福音”就是纯粹的耶稣教。

与纯粹的耶稣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耶稣的耶稣以外的人的说教”。例如，“关于耶稣弟子的教”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耶稣教。因为里面包含了弟子们的主观意见。应该铭记的是，这些关于耶稣的弟子们的说教，在耶稣升天后形成了一种团体性力量，到了公元三世纪其主张受到国家社会的认可，演变成了基督教。从耶稣教到基督教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如①耶稣之教。②关于耶稣的弟子们的教。③关于耶稣的弟子们以外的人们的教。④国家、团体力量的介入。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形成了基督教会，统一了教义，违背其教义的就成了异端。耶稣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同释迦牟尼的教与佛教、孔夫子的教与儒教、老子的教与道教的关系没有太大区别。

这样形成的基督教，在全世界有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两大教会。历史上把曾经从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称作西方教会，反之，把从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称作东方教会。

¹ . 《景教の研究》，第 27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三版。

西方教会又称拉丁教会，东方教会又称希腊教会。广义上的西方教会除了罗马加特力教会即天主公教会以外，还包括公元 15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公教会分离出去的新教各派。广义上的东方教会除了希腊正教会以外还包括东邦基督教会各派。景教就属于东方教会当中的东邦基督教，主要的东邦基督教有波斯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叙利亚教会。其中亚美尼亚教会的宗教信条与景教会有很大的区别，与景教有关系的东邦教会只是波斯和叙利亚的基督教会。

景教的产生，起源于亚历山大教会与安都城(Antioch 安提俄克即中国古书之安都城)教会为争夺君士坦丁堡教父职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公元 427 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教父锡辛纽斯(Sisinius)逝世，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提拔聂斯托留为后继者，第二年 4 月 10 日聂斯托留即位。景教教祖聂斯托留出生在叙利亚的泽曼尼西阿(Germanicia)，其出生年月不详。他是安都市外圣攸普累庇阿斯(St. Euprepus)修道院的修道僧，修学时其教理上并神学上的学说，曾受到摩普绪斯提阿(Mopsuestia)的狄奥多(Theodore)及塔萨斯(Tarsus)的代俄多拉斯(Diodorus)等之影响。由于他博学多闻、声音朗朗、雄辩滔滔，不久便崭露头角，轰动四方，声名压倒君士坦丁堡，东罗马朝廷宫中亦盛传其名。当时非难聂斯托留，责其高傲无礼与充满稚气者亦不少，而聂斯托留本属直性子之人，对于反对党之非难攻击毫不介意，更不幸的是他正好又碰上了西理录这样不择手段之人。聂斯托留在即位仪式的演说当中，对他所认为异端邪说的诸教义大下攻击，惹起各派的极大反感，他在一方面反对基督单一论派主张耶稣只有一性之一人格说，一方面对于当时从埃及开始在东方基督教会流行起来的圣母玛利亚崇拜说非常反感，反对当时新流行语之神母说即尊玛利亚为“神之母”之说。聂斯托留的秘书，信奉狄奥多学说的安那斯泰喜阿斯(Anastasius)主张玛利亚不得称为“圣母”，因这名称是亵渎神威和尊严的。他说“什么人都不能称玛利亚为圣母。为什么？玛利亚不过一妇人而已。说神是从一个妇人而生，不是不可能的吗？”这一说教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城上下人士的愤慨，然而聂斯托留不但不责备安那斯泰喜阿斯，反而大大地为其辩护。聂斯托留引用了狄奥多及代俄多拉斯的学说，屡次倡导反对圣母说，于

是君士坦丁堡内外，议论纷纷，等到聂斯托留等的主张传到埃及，这时亚历山大城之西理录僧正认为机不可失，即倾注全力着手攻击宗教上的强敌聂斯托留，决心要把聂斯托留从教会中赶出去。

结果，西理录通过散布流言，用钱财笼络收买宫中女官的手段，得到了皇后的支持，最后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公元 431 年在以弗所举行的第三届宗教会议上用各种卑鄙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435 年西理录把聂斯托留流配埃及，最后更将所有袒护聂斯托留的百余名监督的职位夺去，焚烧聂斯托留的一切文书，依罗马帝国的国法严禁手持聂斯托留文书。聂斯托留流配埃及后，备受国家行政官权与基督教会的压迫，困苦不堪，后来，埃及的官吏与教会更将聂斯托留赶至埃及西部沙漠之中。聂斯托留在 439 年尚生存。一说死于 454 年。¹

西理录和聂斯托留的斗争，固然是亚历山大城学派和安都城学派的政治斗争，但同时也是思想上的斗争。要说两派之斗争，首先要从基督教世界的两大思潮说起。初期基督教社会存在两大思潮，一个是亚历山大派思潮，另外一个为安都城派思潮。起初亚历山大派神学占据优势地位，可是到后来，亚历山大城的神学研究日益衰弱，基督教神学思想上的霸权地位渐渐被安都城学派所取代。到公元 4 世纪亚历山大城失去了最初热心的研究态度，神学研究渐渐走向了神秘主义，而相反，安都城学派的研究却越来越进步，神学研究越来越科学，成了理论主义神学研究。亚历山大城学派强调基督之神性，认为人性融入神性之中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而这一致同体是神的玄义，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说明的，只能靠信仰来认识。反之，安都城学派强调基督的人性，即人间的要素。其结果，在主张基督的神人合一说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分离开来。

在基督的本质问题上，亚历山大派代表人物西理录坚持在基督里神人两性合一论，他虽然不是后来在埃及流产的所谓基督单一性派，却是这一派的先驱。他在基督里力说神性，称神之性质与人之性质，在基督的人格（Persona）里合一（unity）。基督是神而人、人

¹ . 《景教の研究》，第 197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三版。

而神，基督的人性即是融化于神性中的一个有机的一致同体（organic union）。但此一致同体属于神的玄义，不是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所能说明的，是可以信仰而不可以说明的东西，其实就是神秘主义。反之，安都城学派代表人物聂斯托留，亦主张基督是神而人，人而神，但固守在基督里神人两性说，在基督的人格里强调人性，即人间的要素，主张救世主耶稣基督那里，人间的性质完全无缺。因强调基督之人性，乃不知不觉之间，将基督的神性与其人性区别开来，结果这一派学者，一方面主张基督之神人合一说，另一方面又把基督之神人两性分开为二，而变成基督之神人两性说或基督之两人格说了。

这次较量，虽然以亚历山大城的胜利而告终，但最终亚历山大城教会以处罚聂斯托留为条件，基本接受了安都城教会的教义，聂斯托留实际上成了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安都城教会也对教义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开始称玛利亚为“圣母”，也开始使用起了一致同体的词语。德莱柏在所著《宗教与科学的斗争史》中论及聂斯托留时说，“由于排斥景教思想，基督教会成为科学之敌，失却了救济人类的好机会”¹

亚历山大城学派的代表人物西理录和安都城学派的代表狄奥多的高弟聂斯托留之间展开的关于基督本性的论争，是研究景教本质所不可缺少的要件。而聂斯托留的学说起源于他的恩师狄奥多。狄奥多是公元4世纪末东方教会的思想代表，他的信仰支配此后东方教会百十余年，给基督教会的教理，放出了一道曙光。

狄奥多关于基督神人两性关系的大要如下：

“耶稣作为神的独生子降生人间。神性与人性在耶稣这里合一同体。因此，作为一个人的基督有着无法看见的神的性质。这就是耶稣·基督之所以被称为神之子的原因所在。若要说起为何神选择了耶稣，那就只能是神对耶稣的特殊恩惠了。万能的神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但在基督那里，神性和人性始终是以单一人格的人类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如此，基督成了真神停留之所，在圣灵的力量下表现出了灵应事迹，达到智德圆满的境界，拥有了拯救众生的能力。”²

¹ . 转引自《景教の研究》，第258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年6月第三版。

² . 《景教の研究》，第251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年6月第三版。

下面来讨论景教的性质，讨论聂斯托留的学说是否构成异端。景教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说景教是基督教之一派，有人说是基督教的异端。不管是哪一种回答，都确实表达了一方面的真理。若景教为基督教之异端，那就要指出构成异端的要素。根据前面的景教思想，佐伯认为景教与基督教正统派之间在信仰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¹但在基督教世界里，景教通常是被视为异端的。景教被斥为异端，述说着公元4、5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里的宗教理论骚动和宗教行政上的权力斗争之激烈。

为了把聂斯托留派定为异端，聂斯托留的反对派诬蔑景教倡导萨默撒塌（Samosata）的保罗（Paul）的教义。根据保罗的教义，耶稣只是一凡人，只不过得到了高于一般人的神的恩宠。并不是神的独生子降生到了人间，而是普通的圣贤之人即人类的孩子升天了。寄生在耶稣身上的神力随着耶稣身体的成长和智能的开发得以圆满，最后，耶稣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了神性。²若如萨默撒塌（Samosata）的保罗所说，耶稣与释迦牟尼、孔子、老子是同样类型的人。这样的学说绝不是公元5世纪的基督教会所能容忍的，也绝不是聂斯托留的教义。是反对派诬蔑给聂斯托留的。

其次，反对派还声称聂斯托留主张理应为一人格之耶稣·基督拥有二人格；还主张基督是人之子、神之子，是人神二子。实际上，反对派强加给聂斯托留的这些主张，聂斯托留一直是反对的。他坚信独一无二的神的独生子耶稣说。所以，将耶稣二人格说加给聂斯托留实在是冤枉了他，只不过他的恩师狄奥多的学说当中有一些可以被解释为基督二人格说的东西。恩师前辈的学说，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了聂斯托留，使其触礁沉没。但不管怎样，都不能说聂斯托留倡导了安都城学派毅然反对、公然禁止的基督二人格说或神子二人说。最起码，并没有将这些罪状加给聂斯托留的足够证据。

若一定要找出景教之异端性，那就只有他反对玛利亚圣母说这一点了。玛利亚圣母说是当时的流行标语，为多数说。不管其反对玛利亚圣母说的动机是什么，但聂斯托留不顾舆论，贸然反对当时的流行学说，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教主欠考虑、宗教行政政策拙劣都是显而易见

¹ . 《景教の研究》，第263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年6月第三版。

² . 同上，第259页。

的。只是关于玛利亚圣母说，从来没有一次宗教会议将其列入教义当中，更何况，聂斯托留本身也明确表示，只要“圣母”一词不是“女神”的意思，他是绝对不会反对的。按当时的基督教义，聂斯托留的所谓异端性是无法成立的。只是，西理录在以弗所宗教会议上攻击聂斯托留，根本就没有给他辩论的机会。这就是到如今，景教依然被视为异端，却找不出其异端性的原因所在。

下面论述聂斯托留与聂斯托留派的关系，聂斯托留并非创立聂斯托留派之人，但与聂斯托留有相同主见的信徒被赶出罗马境内，到了波斯，更深入到东方各国是事实。波斯的基督教会仰慕聂斯托留的高德，热情欢迎了聂斯托留一派。因此，从波斯传到西域各国以及中国的景教学说并非纯粹的聂斯托留学说，是在其恩师狄奥多的学说的基础上融入波斯思想的特殊的东方性的基督教。这就是中国的景教和聂斯托留本身的学说存在差异的原因。因此，就算中国景教在基督教教会看来存在异端性，但其异端，究竟是不是聂斯托留学说的异端性也是不容易判断的。

关于景教信仰，现如今并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研究。因为自从景教被斥为异端之后，聂斯托留的著作几乎都被烧却。而反对派所使用的攻击聂斯托留的材料多为后世的伪造或对聂斯托留的学说断章取义，目的是为了判聂斯托留为异端，遂不足信。作为聂斯托留学说可以确定的是，聂斯托留追随恩师狄奥多的学说，主张“基督的人性神性并列说”。即聂斯托留主张“基督拥有人性和神性两性，因此，基督是拥有全然不同的神与人二性质的单一人格者”。在聂斯托留时代，已有教会人士称圣母玛利亚为“圣母”，可聂斯托留主张玛利亚并非“圣母”，而为“基督之母”。断言由神创造出来的人类生产造物主之神是不可能的。基督为拯救人类、为人类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神是绝对不会有死亡的，在玛利亚母体内成长的并非神本身，而是由神安置下来的人性。只是由神安置下来的人性里存在着神性。¹在理论上，聂斯托留将基督之神性与人性区别开来了。但聂斯托留始终坚信基督是神人两性合一无二的一人格者。

¹ . 《景教研究》，第 266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聂斯托留始终主张基督之完整人格，因为基督只有为完整的人，才能为人类赎罪，为人类而死，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马丁·路德在公元 1539 年所著《宗教教义及教会论》谈及第三次以弗所会议，论及聂斯托留问题，以为法王的宣告书，法王厅学者批难聂斯托留都不过说聂斯托留否认基督的神性，以基督为普通人，把一人格的基督，说成神与人二人格。然而与攻击者相反，聂斯托留绝不相信有两个基督，而只信有独一无二的基督，确信基督是真神而且是真人，在一人格上具有神人两性，这一点和全公会最初信仰全然相同。¹ 基督新教在耶稣基督之外，不认为有介在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因而认为圣母玛利亚的介在没有其必要，他认为，反对玛利亚崇拜主义，基督新教受了景教的影响。若景教为异端，那基督新教也应该在异端之列。²

公元 432 年以后，景教残党被逐出罗马帝国领地，进入波斯领，受到波斯皇帝卑路斯的保护，在斯宾 (Seleucia-Ctesiphon) 设立本山，在公元 498 年前后成立一个独立的基督教会，即景教会。景教会又被成为东部叙利亚教会。而这东部叙利亚教会在公元 1681 年又分裂出 (The Chaldean Church) 或 (The Assyrian Church)。这一教派是景教中皈依罗马法王厅和基督单一性派中的一分派结合而成的。这一教派得到法王厅的保护，越来越兴盛，而狭义的景教却濒临灭绝。

四、中国境外之景教文献

景教文献占据叙利亚文学的大部分。所谓叙利亚文学大部分是翻译文学，并非叙利亚国民的创作。因此，叙利亚文学既没有希腊文学那种自由奔放的伟大戏剧、也没有中国文学那样寄托于山水花鸟之中的美的感慨与余韵。只是将希腊语作品翻译成叙利亚语，又或者将希腊语的关于基督教的作品进行翻案，使其变成叙利亚文学。那么，叙利亚文学研究者列楠 (Renan) 评价叙利亚文学的词为“平平凡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将这评价用在景教文学上也是妥当的。

叙利亚文学以公元 4 世纪至 8 世纪为其隆盛时期，公元 9 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勃兴

¹ . 《景教の研究》，第 276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同上，第 277 页。

与景教的衰亡，叙利亚文学亦陷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到公元 14 世纪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敦煌文书中的《尊经》的末尾写道“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¹这里所写 530 部，经学者们的认证，认为它是景教文献全部最大的数字。

自从景教教主聂斯托留被宣告为异端而遭破门之后，所有景教文书都被烧毁，从公元 4 世纪到 14 世纪约一千年间景教文献几乎无保留。少部分传到现在的景教文书，是限于罗马教廷认为害处较少的部分。虽然罗马教廷不许刊行的景教文书，如聂斯托留的遗书，也偶然发现，但那是凤毛麟角；至于敦煌文书中的景教文献，那就根本不是叙利亚文了。

罗马教廷所保存之景教文献，现存有三种。第一，《东方文献》(Bibliotheca Orientalis)。第二，《圣遏拂菻全书》(Sancti Ephraen Syri Opera Omnia in Sex Tomos Distributa)。第三，罗马教廷所保存之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等之稿本文献目录。其中，第二、第三能作为景教研究资料的甚少，在罗马教廷所保存的景教文献中可供研究用的，不得不推《东方文献》了。

《东方文献》总共三卷四册。其中第一卷属于叙利亚教会正统派基督教文献，第二卷是关于基督单一性派的文献，都与景教无关系。第三卷分上下二册，上册共 707 页，下册共 962 页，都由 1728 年罗马出版。上册本文 199 章载公元 1 世纪到公元 14 世纪景教会所用文献，附录 63 章载公元 13 世纪末 (1298 年) 埃陪特·耶稣的《景教文献总目录》。下册全部为景教论，即景教的历史与景教的异端性的证明，作为景教研究资料，此书的地位无人能比。因为景教一般被认为异端，故关于景教文献上下二册的出版，在罗马教廷严格的检阅制度之下，经过了相当的删减和订正。

罗马教廷以外保存于西洋各国的景教文献虽非常少，但仍然是研究景教的重要对象，尤其关于聂斯托留遗书的发现，给研究者以颇为贵重的资料。还有从聂斯托留反对党所引用的攻击材料，虽然只是零星片段，而对于明了聂斯托留的学说却大有用处。

称为聂斯托留遗书的《The Bazaar of Heraclides》，原文为叙利亚文，意译为《关于赫

¹ .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第 212 页，翁绍军校勘并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 11 月。

拉克利特子孙的事业》，研究景教本质，没有胜过此书者。这种译法出自佐伯好郎。原书为 450 年前由聂斯托留本人以希腊语写成，而由希腊语翻译为叙利亚语则在 450 年之后。由于译者的无能，对于本书题目，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原希腊文本应译为“business”即“事业”，而误译为“bazaar”即“市场”，以致“Bazaar of Heraclides”变成精神的知识陈列所了。卢弗斯虽明知其为误译，却主张把“bazaar”解作英语的“treatise”即“论”之意。佐伯好郎批评卢弗斯，认为仍有问题，因为希腊语之“Heraclides”是说 Heracles 的子孙，这是根据希腊古代神话，聂斯托留以 Heraclides 自比，以景教信徒比 Heracles 之子孙，言外之意，希望将来他的子孙所做事业是从不正当的反对党手中夺回精神界领土，为自己雪耻，所以，应译为《赫拉克利特子孙的事业》。¹本书原来是聂斯托留为辩护自己主张的正当目的而作，内容分为历史的部分和神学的部分，详述西里录对聂斯托留争论问题的历史，全部为神学上的议论。其论述方法是希腊哲学家所好用的问答的辩证法，聂斯托留悉数指出反对派的谬误，证明安都城神学主张的正当。

《聂斯托留遗书》由德国哈礼大学教授卢弗斯编写。这本从攻击聂斯托留的文章中搜集语句而成的书籍，虽所引用的未必是聂斯托留真意，但使人们在过去 1500 多年过去之后还得以窥见聂斯托留言论之一斑。关于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景教文献，放在关于中国景教的问题上进行论述。

五、景教传来中国

1、景教传来中国的时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是记载景教传来中国以及其后 150 年间景教在中国历史的唯一文献。根据景教碑文，景教高僧阿罗本（Abraham）率使团于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来到长安。关于此事，本文中写道“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迎宾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²又根据本文，在贞观十二年景教得到朝廷的公认，用官费建立大秦寺，度

¹ . 《景教の研究》，第 446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第 54 页，翁绍军校勘并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 11 月。

僧二十一人。这就是通说中将景教传来中国的时间定为公元 635 年的原由。

但是，佐伯认为，在景教正式传入之前，唐王朝与波斯政府亦或景教本部应有过联系。要不然唐王朝也不可能出外迎接外宾。景教传教团公开来朝证明在这以前景教已非公开性地传到了中国。毕竟，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通早已开通；大秦商贩的通商活动早在大秦景教传来以前就已很活跃了；唐与大秦国存在通事制度。要实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最需要的是翻译人才。景教传到唐朝，得以拜见皇帝，都说明当时有这样的翻译人才。而培养这样的翻译人才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古代中国，外国人归化者颇多，因而，也出现了很多混血儿，而这是得到翻译人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景教来朝之际，充当波斯语和中国语翻译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混血儿。¹

佐伯认为景教在唐贞观九年前应该已传到中国，反对在这之前景教绝对没有传到中国的学说。²

2、显示唐代中国景教盛衰兴亡的记载

在唐朝 285 年的时间中景教存在的时间大约为 250 年。景教碑文中所说“高宗皇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³，虽为夸张手法，不足信，但至少说明在景教正式传来 15 年后的高宗皇帝（公元 650 年—公元 683 年）的时代，多少有了一些景教信徒、景教赞同者或景教同情者。景教传来 50 年间中国与波斯的亲善关系达到了鼎盛期，这表明景教的传来加深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关系。正好在贞观九年到十五年波斯被回教徒所征服。景教法主将阿罗本派往唐朝，一是为基督教传教之目的，其二因波斯国运危急，而在波斯国保护下求生存的景教本身也面临着危机，景教的到来，可能一方面是为波斯向大唐求援，另一方面是景教本身想在中国寻找一条活路。

此后，到武则天圣历年间（公元 698 年—公元 699 年）景教受佛教压迫，先天（公元 713

¹ . 《景教の研究》，第 510、511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同上，第 514 页。

³ . 同注释 1，第 57 页。

年)末受道教排挤,中国景教会陷入危机之中。所幸波斯本国景教会的后援而得以维持。景教碑中对当时的窘状如此写道“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¹。而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则天武后的记事中记载有“天授二年夏四月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在另一方面证明景教碑所言。赞颂为景教的生存而派到中国来的人们的功绩,景教碑写道“有若僧首罗舍,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²。对于大德及烈的来朝,及烈用珍奇异巧之物将唐朝高官尽收自己药囊中的事实已被中国历史所证明。第一个找出波斯僧及烈事迹的为日本的桑原鹭藏博士。

天宝初玄宗皇帝派高力士将太宗以下五帝之画像送至大秦寺,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宣召大德佶和(George)僧罗舍(Abraham)等17人于兴庆宫举行景教礼拜式。可见当时景教所受朝廷之器重。关于此事,景教碑中写道“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舍僧普论等十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³

虽难免有些夸张,但还是可以相信的。此外,虽然在景教碑中未提及,但在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鼓动玄宗皇帝将一直以来俗称之“波斯寺”改称“大秦寺”。关于安史之乱的评定中景教所立下的功劳虽然除了景教碑以外还没能从其他历史史料中找到其记载,但若知景教碑的建立是为了歌颂伊斯而建,而这伊斯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将军郭子仪的参谋的的事实的话,景教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所立下的功劳是可以想像的。

在动乱的白热化时期取代玄宗皇帝而即位的肃宗皇帝为了表彰在安史之乱中忠诚于唐王室的景教徒,在他即位之时,重立了在灵武的景教寺院。然后到代宗皇帝时期,虽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但景教也得以出入宫廷。这些就是景教碑中记录下来的唐代150年间景教徒活动之大要。下面论述景教碑以外关于景教的一些记事。

景教碑建立以后不出三年,建中四年(783年)朱泚谋反,自称大秦皇帝。朱泚与景教究

¹.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第58页,翁绍军校勘并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

². 同上。

³. 同上,第59页。

竟有何关系，史无明文，但既自号“大秦”，自然让人联想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述者波斯僧景净，根据僧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七卷般若传中可知景净经般若法师之表弟罗好心的介绍，与般若法师共译佛经。而这位罗好心，是神策军的大将，为唐军中身处高职的外国人。可见，景净与神策军关系密切。而朱泚谋反，主要是靠神策军，这一层干系很难完全摆脱掉。因此佐伯推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埋没的时间有可能为这一年。¹

唐代景教的衰亡，佐伯认为与两大事件有关。其一为会昌五年全国性的废佛毁寺运动，其二为乾符五年前后唐末动乱。唐武宗皇帝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实行废佛毁寺运动，记载三夷寺僧侣两千余人还俗，而另据旧唐书十八卷，三夷寺僧侣的总数有三千，若平均下来，那景教人数也有一千人，经过这件事以后，推测很多景教徒逃往关外或边塞。景教碑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年被埋没的。唐末黄巢之乱使中国境内的景教陷入几乎全灭的地步。当时唐朝军队中景教徒占多数。乾符五年（公元 878 年）黄巢起兵造反，在广东屠杀回教徒、犹太人、景教徒、拜火教徒等十二万外国人，若平均下来，被杀害的景教徒大约也有三万人。²

五、元代的也里可温教

自唐末以至五代北宋、在中国本境已经绝迹的聂斯托留派基督教，事实上在中亚一带仍旧存在。新出土的文献、遗物足能证明这一点。德国学者在吐鲁番所得的文件，七河同伊犁聂斯托留派坟墓的碑文，这些碑文大致是 1200 年至 1360 年间之物。还有伯希和在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发现的景教墓石等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元代称聂斯托留派即唐代的景教为也里可温教。

公元 13 世纪是蒙古人的天下，不管是西欧的基督教国还是西亚的回教国都为之震撼。这一伟业就是由铁木真创下的。公元 1203 年铁木真先歼灭了蔑儿乞惕部族(Merkit)，到公元 1206 年成为整个蒙古的统治者，自称成吉思汗，公元 1208 年更将乃蛮(Naiman)部族、维吾尔部族歼灭，到公元 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共打败了 40 多国，将波斯的 40 万军队歼灭，打败了

¹ . 《景教の研究》，第 526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同上，第 531 页。

俄罗斯的大军。但不能忘记的是，成吉思汗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的时期正是中国塞外边疆地区的景教遭受重创的时期。因为被成吉思汗所歼灭的蔑儿乞惕部族、乃蛮族、汪古惕(Onguit)、唐兀惕(Tangut)、维吾尔部族等都是景教徒部族。被成吉思汗所灭的40多国民族中景教教徒绝不会是少数。从这一点上来说，成吉思汗是在根本上给中国塞外景教以重创的第一人。¹

很多学者主张景教在元朝的复兴。这也不奇怪，因为出现在元史列传中的人物当中就有二十多人与景教有关系。但佐伯认为，这些主张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没能全面地洞察问题。他认为是成吉思汗将景教引向了灭亡。元代的景教在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兴盛只是昙花一现。这么说来，就不是复兴，是在等待着自行灭亡。

佐伯估计学者们是从以下几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一，公元13世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的纪录。第二，比起唐宋时代，元代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有关景教资料。第三，根据当时中国的文献资料，还有公元13世纪西欧的资料，蒙古朝廷中有很多信奉景教的大官、名医，蒙古王朝的宫廷中有很多信奉景教的皇妃。²在表面上看来，景教是勃兴了。但若仔细洞察其本质，就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第一个原因，佐伯认为十字军(The Crusade)失败后，西欧基督教国家在报道的时候大大夸张了元代景教的情况。这就是西欧学者高估了元代景教的原因之一。³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原因。比起唐代的有关景教的纪录，元代所有有关景教纪录之多着实让人感叹。佐伯简略地介绍如下：

- 1、金元好问的《中州集》中收有扬云翼游大秦寺之诗。
- 2、同上的《遗山集》中有恒州刺史马氏神道碑。
- 3、上面所收其实为收在《金史》一百二十四卷列传中的景教名门马庆祥的神道碑。
- 4、金华黄先生文集中收有马家世谱。
- 5、《元文类》、《石田集》均收有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此为景教徒马庆祥之子月合乃

¹ . 《景教の研究》，第556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年6月第二版。

² . 同上，第557页。

³ . 同上。

- (Johane)的神道碑。撰写者为马祖常，是月合乃的僧孙。
- 6、《元文类》二十三卷有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此为景教部族汪古部的阔里吉思王(Georgis)之碑文。
 - 7、程矩夫的《雪楼集》五卷有爱薛(Isaac)受封为拂菻王，其妻沙喇受封拂菻王夫人的记事，还载有拂菻忠献王神道碑。这就是收在《元史》一百三十四卷忠的阿锡页(爱薛 Isaac)神道碑。根据此列传以及神道碑，他是元代景教徒名医。
 - 8、至顺镇江志有关于镇江的景教徒户数、寺院数量以及景教出身的有影响者的姓名的记载。
 - 9、《元史》一百二十卷收有元右丞相、法烈台族出身的镇海的传记。
 - 10、镇海与耶律楚材共同辅佐元太祖打下元朝的基业，为蒙古的大功臣。据说皇帝的诏书若没有镇海的回鹘文副署就无法在中国北方发布。这在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北方景教徒分布之广，在另一方面也可推测当镇海被宗敌所杀之后景教徒所受之迫害。但若据许有壬撰写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镇海得以终老。(元文类六十七卷)
 - 11、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西游记》中记载，公元 1221 年到 1224 年镇海与丘处机同在帝侧。
 - 12、《至元辨伪录》将景教徒称作“迭屑”人，毋庸置疑，“迭屑”为景教碑文中的“达娑”，波斯语之“Tarsa”，为“虔诚的人”或“信仰神灵的人”，就是指景教徒。
 - 13、同样是在《至元辨伪录》中第四卷记载有皇帝的一近臣景教徒博刺海(Bolgai)受蒙哥汗之命，同佛教僧侣、道教道士进行宗教讨论。
 - 14、《元史》中有景教徒阿勒古斯托克塔古理合窿奇稣列传。
 - 15、从元朝的法制上观察，《元史》八十九卷百官志中有“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默尔(Mar)根锡(Kasisa)尔奔(Rabban)伊噜勒昆(Arkuhun)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

延祐二年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伊噜勒昆，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的记载。

- 16、元朝皇帝的诏书中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庇护助里”的句子开始，很显然，这是景教的常用文句。
- 17、《元史》三十八卷至元元年有臣上奏“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布济克太后御容，请定祭礼”。
- 18、元朝的二景教僧在景教会以及欧洲基督教会、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此二人为把·扫马（Bar Sauma）和马可（Markus）。¹

这么多的纪录，远非唐代所能比。但佐伯认为若仔细观察，发现这些都并非景教的直接资料，而为间接资料。只看这些间接资料而判断元代景教资料比唐代多，显然是有失全面的。

最后，关于第三个原因，佐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元朝的皇室中有很多信奉景教的妇女，也有一些信奉景教的王子。如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皇后当中有怯烈族出身的托果斯皇后，蔑儿乞特族出身的呼兰皇后，乃蛮族出身的哈勒巴津皇后；窝阔台汗（太宗）的皇后当中有脱列哥那；窝阔台第三子曲出之子失烈门（Solomon）；定宗之子脑忽（Noah）、忽察（Khutcha）；在七十多鄂儿多人中有一些景教徒；拖雷的皇妃唵鲁忽帖尼别吉（Sarakutani bagi），此唵鲁忽帖尼别吉是王位继承中对景教徒大开杀戒的蒙哥汗（宪宗）、忽必烈（世祖）、建立波斯伊儿汗王朝的旭烈兀汗的生母。死后以布济太后的身份葬在甘肃甘州路的十字寺内。（《元史》三十八卷）

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这些史实中得出景教在蒙古复兴的结论。佐伯指出这是他们没能充分了解元朝本质之故。他认为蒙古王朝宫廷的本质、秘密是极端的一夫多妻制度，异族统治政策的秘密是景教徒排斥运动后重用回教徒，使回教吞并景教。³

¹ . 《景教研究》，第 558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同上，第 562 页。

³ . 《景教の研究》，第 562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元朝统治者实行极端的一夫多妻主义。根据《元史》，成吉思汗有后宫四十余人，太宗为七人，宪宗为六人，世祖为十人。在这些后宫当中信奉景教的妇女本来都是元朝的俘虏，就算以后贵为皇后，皇妃，但毕竟无法逃离奴隶的出身，她们对俘虏自己的蒙古暴君的宗教感化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她们不顾父母兄弟、亦或丈夫被元朝军队所杀，为保全性命而苟活在元朝皇宫当中，违背景教之一夫一妻制度，成为众多后宫的一员，可见她们自己的信仰也已经大打折扣。且在元朝皇帝的后宫中不仅有景教徒，还有回教徒，高丽人。摆布太宗杀害失烈门以下七十多景教徒，还将镇海杀死的就为回教徒皇后法特玛（Fatama），而且蒙哥汗，忽必烈的皇妃多数为回教徒，忽必烈时代是回教皇后的全胜时期。以上事实说明，不可对元朝后宫景教徒的势力与感化力期待过高。

说起元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在景教徒屠杀后重用回教徒，使回教吞并景教。成吉思汗重用了一些异族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景教徒镇海，回教徒牙刺控赤（Muhammed Yelvajeh）。而耶律楚材在五十五岁时愤死，杀害镇海，屠杀景教徒都是回教徒所策划的。

佐伯将元朝景教衰弱、回教兴盛的原因归结为景教的一夫一妻主义败给了回教的一夫多妻主义。回教正好迎合了中国原有之一夫多妻主义，而景教却遇上了水土不服。还有就是如唐朝景教衰亡，背后没有国家团体的支援。¹

说景教的一夫一妻制使元朝的景教走向灭亡，这种看法是比较牵强的。朱谦之在《中国景教》中就批评了佐伯的这种观点。²景教与回教之间展开的宗教斗争最终以回教的胜利告终，这里面肯定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不能归罪于景教的一夫一妻制。更何况，在元朝皇宫中人，除了极少数景教徒（唐之功臣尉迟敬德拒绝太宗将公主许配给他，坚守一夫一妻主义，贵油汗的皇妃干兀立海迷失、拖雷的后妃唆鲁忽帖尼别吉都坚守了一夫一妻主义）以外，多数人并没能遵守这一制度。说景教败在了一夫多妻制，倒不如说败在景教徒自身的腐化堕落、信仰不坚定上。

可想而知，元朝景教在表面上的兴盛其本质却是景教在渐渐走向灭亡。

¹ . 《景教の研究》，第 568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中国景教》，第 214 页，朱谦之著，东方出版社，1993 年 5 月。

六、中国景教的文献资料

佐伯好郎在《景教之研究》中涉及的关于中国景教的文献资料如下：

中文文献有：

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②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③尊经④景教经典一神论⑤序听迷诗所经⑥志玄安乐经⑦大秦景教宣元本经。¹除了这些以外，后来他从小岛靖手中求得《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作为附录收录在其《清朝基督教研究》中。

佐伯对这些文献的真实性没有持怀疑态度。

而近年，林悟舒在《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对其中的《景教经典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以及后来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2

叙利亚语、其他外国语文献有：

①北京故宫城午门楼上发现之叙利亚文古抄本②德国中央亚细亚探险队在中国土耳其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祈祷书③伊犁、七河地方（原为中国领土，伊犁条约时割让俄国，现为俄罗斯领土）出土的景教墓石中所记载的文字。³

中国内外发现的景教遗物有：

①元代十字寺②在高昌发现之景教寺院壁画③敦煌发现之景教画像④中国绥远省鄂尔多斯地方出土之十字架徽章⑤保存在绥远省西湾子的景教十字架雕刻石片⑥河北省房山县三盆山旧十字寺境内发现的刻有叙利亚文和十字架的大理石⑦北京郊外出土之景教墓石⑧保存在扬州回教寺院的景教徒墓石⑨福建省泉州的景教遗迹⑩鞍山出土的瓦制十字架⑪福冈县博多元寇纪念馆保存的刻有景教十字架图案的盔甲。⁴

对这些景教文献和景教遗物，佐伯在《景教之研究》中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解说、注释

结论

¹ . 《景教研究》，目录第 6 页到 7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² . 《唐代景教再研究》，林悟舒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 月。

³ . 同注释 1，目录第 9 页。

⁴ . 《景教の研究》，目录第 10 页到 12 页，佐伯好郎著，名著普及会，1980 年 6 月第二版。

佐伯好郎的《景教之研究》将景教的意义、本质，景教变迁的历史，景教盛衰兴亡的过程展现给了读者。在本书中，佐伯研究了景教与基督教的异同，在研究景教传来中国的问题上，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内外发现的景教经典的解说和景教遗迹的说明上。

作为外来宗教，景教曾经有过自己的一席之地，可却没能保持住，最终走向了消亡。其原因何在？这是佐伯致力于解决的关键所在。研究景教在中国的遭遇，对当今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在东方国家的传教事业的成败与否也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景教传到中国 7、8 百年的时间当中作为宗教团体没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佐伯认为在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大块。

内部原因：

- 1, 景教的本质。作为景教传统信仰的不管是处女玛利亚诞下耶稣还是耶稣复活升天，都没能给当时的中国民众带来什么新鲜感。所谓精灵崇拜、轮回思想，古往今来都没有什么民族能比得过中华民族。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面对景教说教以为是中国民间思想的胡化，轻视景教，根本不以为景教是西方文明国家的大宗教思想，也根本就谈不上敬仰了。换言之，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的民众并没有从景教教主阿罗本等人的传教中得到感化。景教徒在长安的遭遇如同使徒保罗在雅典的遭遇。西方基督教吸收了希腊思想而成为集大成者，而景教依赖、寄生于中国固有的民俗思想没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最终被中国的道教等吸收同化了。
- 2, 景教的理论。景教传教师所宣传的帝王崇拜主义、父母孝养主义、博爱慈善主义都能从中国固有的仁义忠孝思想中体现了出来。基督教一直引以为豪的“爱自己的敌人”的教义，比它早了五百年，中国就有了“以德报怨”的成语。对于唐代的长安人景教教义丝毫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外部原因：

- 1, 中国的景教会失去了本国政府或本国国民的支持。罗马教会在它开始的阶段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支持，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它也独立了起来，得到了各国政府的保护与援助，而

景教从本国政府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的援助。

2, 中国的景教会没能从中国人、汉民族中得到景教的高僧或教徒。

3, 在中国, 没能真正确立景教神学体系。

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种:

A, 中国的景教主要流传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最初是在突厥族之间, 后来在其他塞外民族之间流传下来。

B, 中国人当中皈依景教之人比较少。

第三章 佐伯好郎在景教研究上的贡献

景教研究开启了佐伯好郎学术生涯的大门，一经开启，直到 94 岁高龄去世，这扇大门一直都没有关上过。

世界上很难找出像佐伯这样对景教研究专一的学者了。持续一生的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众多书籍，论文的发表就是一例。在景教研究界，对佐伯的学说有人推崇，有人反对，却没人能漠视他的存在，他在景教研究上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佐伯好郎在景教研究上的贡献。

第一节 佐伯好郎的景教、中国基督教研究论著

第二章论述的是两本在佐伯景教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景教论著。现将佐伯的景教、中国基督教研究论著整理如下：

- 明治 41 年（1908 年）：在《地理杂志》第一百号发表论文“论太秦禹豆麻佐”。
- 明治 44 年（1911 年）：待漏书院发行、三省堂出版《景教碑文研究》。这是佐伯第一本景教研究书籍，因此书的出版，佐伯开始在景教界展露头角。
- 大正 5 年（1916 年）：伦敦的 S·P·C·K 出版《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此书是在牛津大学塞思教授的强烈怂恿下写成的。为《景教碑文研究》的英文版，此书的出版，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很快就在欧洲确立了佐伯好郎作为景教研究专家的声望。他在此书的附录中为景教碑文所做的注释广为不擅中文的欧美国家的学者使用。
- 昭和 6 年（1931 年）：11 月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做题为“关于中国景教”的演讲。12 月 8 日在《东方学报》东京第三册上发表论文“大秦寺所在位置”。12 月出版《关于中国景教》。
- 昭和 7 年（1932 年）：9 月待漏书院出版《元主忽必烈派往欧洲的景教僧的旅行志》。12 月春秋社出版《景教文献及遗物目录》。

- 昭和 8 年（1933 年）：2 月《宗教研究》第十卷第二号发表论文“景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6 月《宝云》第二年第二册发表“关于中国绥远县出土的万字十字架徽章”。11 月《东方学报》东京第四册发表“关于北京宫城午门楼发现的叙利亚文古抄本”。
 - 昭和 9 年（1934 年）：12 月《东方学报》东京第五册发表论文“吕祖全书考”。
 - 昭和 10 年（1935 年）：11 月东方研究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景教之研究》。
 - 昭和 11 年（1936 年）：2 月《东方学报》东京第六册发表“隐藏在汉字里的外来语问题”。5 月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第三次东方文化讲演会上做题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所引发的典礼问题的过去与现在”的讲演。
 - 昭和 12 年（1937 年）：6 月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The Nestorian Documents Relics in China》。
 - 昭和 14 年（1939 年）：1 月《东方学报》第九册发表论文“谈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出土的景教遗迹”。
 - 昭和 18 年（1943 年）：7 月春秋社出版《支那基督教研究》（一）。12 月春秋社出版《支那基督教研究》（二）。
 - 昭和 19 年（1944 年）：3 月《蒙古》第一卷第三号发表论文“关于满蒙基督教”。8 月春秋社出版《支那基督教研究》（三）。
 - 昭和 24 年（1949 年）：3 月春秋社出版《清朝基督教研究》。
 - 昭和 30 年（1955 年）：5 月在京都同志社大学内的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研究室讲演“景教在中国衰亡史”。9 月《哈佛·燕京·同志社文化讲座》第七号出版《景教在中国衰亡史》。
 - 昭和 32 年（1957 年）：12 月春秋社出版《罗马帝国基督教保护规定研究》。
 - 昭和 35 年（1960 年）：12 月杂志《道》掲載《罗马法学思想对基督教成立的影响》。
- 佐伯为景教、中国的基督教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笔耕不辍，如此繁多的研究论著为景教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佐伯好郎发现景教十字架

佐伯好郎在景教研究上的贡献不仅在体现在他的研究论著上，佐伯在中国还发现了景教十字架。

昭和六年（1931年）秋，以佐伯好郎为团长，由中央大学教授法本义弘、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杉村勇造、德国人米勒博士，加上随从人员共22人为寻找景教十字架而向北京附近的房山出发了。

房山地处中国北部，为土匪猖獗之地。此行的目的是佐伯依据景教文献记载欲在房山寻找景教十字架。这次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佐伯一行仔细勘察了距离房山有18里远的深山，不仅在十字寺遗迹大雄宝殿的庭院发现了大辽应历十年（公元960年）建立的“大盆山崇圣院碑”以及大元至正二十五年的“敕赐十字寺碑记”，还发现了在景教界被称为解开景教东迁之钥匙的高约半米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四周还发现了刻有叙利亚文诗篇的大理石。

1931年，由于日本的侵略行为，中日关系已相当恶化，可即使这样，《北京晨报》、《世界日报》、《益世报》、《京报》、《庸报》等大报还是以“日人佐伯好郎一行发现景教遗迹”为题，报道了佐伯一行对学界所做出的贡献。还写道“日人佐伯教授一行对具有如此重大价值的文物就这样被放置在深山中无人照料感到非常痛心，言就算需自理一切费用，也要把此珍贵文物保存在北平古博物馆。”¹《庸报》还加上了“文物机关要引起注意”的大标题。报道过后的第二天，佐伯好郎与米勒教授联名在《英文北京导报》上做了报告，并表示希望对十字架进行应有的保护。

佐伯好郎一行的此次发现，使文物保存会开始行动，再次派遣调查员进行实地勘察，将文物运至北平，与佐伯一行带来的“三盆山崇圣院碑”、“敕赐十字碑记”的拓本一起陈列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里，爽快地接受了政治上的敌对国——日本的学者对景教学界的好意。比起试图将中国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运出中国去的何尔漠，佐伯作为学者的高尚品德

¹ . 转引自《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下）第996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足可窥见一斑。文物需要公布于世，供学者们参考，文物需要大家来爱护，但并非据为己有。

结束语

佐伯好郎的一生，是追求知识的一生，用知识武装自己、艰苦奋斗的一生。作为日本明治时代的人，他追求知识的环境远没有现代人方便。明治时代的日本，全国只有两所高等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后来的东京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后来的京都大学）。当时的学者，大多出自这两所大学。佐伯并没有进入高等学府，他的知识，是靠自己持之以恒的毅力，在私立学校里、在自费留学中、在后来的教学、学术生涯中不断补充、完善起来的。

佐伯如火纯青的英语能力也基本靠自学，可谓自学成才的典范。进行景教研究丰富的语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在涉足景教研究之前，佐伯从事英语教学，英语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他的外语，虽有基础，却还远未达到能熟练运用的程度。汉文知识只是儿时在家乡学习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难免退步，拉丁语、希腊语、叙利亚语也只是一点基础。这些问题他都是在景教研究过程中，靠艰苦的自学克服下来的。佐伯自称“到60多岁时为了读懂叙利亚语景教文献，我还在刻苦学习叙利亚语，学习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会晚的。”¹除了语言，景教研究中宗教学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佐伯19岁受洗礼，成为圣公会教徒，在宗教学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对天主教、基督教的深刻认识，使得他能清楚地看到景教与天主教、基督教的联系与区别。

佐伯好郎的景教研究，在资料的挖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景教研究上提出的观点，都是在大量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这些材料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其他与景教有关的国家的。《景教碑文研究》是佐伯研究景教的初期阶段的成果，可以看出，材料的掌握、应用相对较少，而到景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景教之研究》，材料的掌握、应用都到了成熟阶段。得出的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景教碑文研究》，作为他的景教研究处女作，意义深刻。他的研究风格从这本书就已开始形成。那就是注重材料，用材料说话。尤其是他在这本书中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的注

¹ . 《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第153页，法本义弘主编，大空社，1996年7月。

释及翻译在不识中文的欧美学者间广泛流传，被视作权威。

《景教之研究》，是佐伯景教研究的最高峰，运用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对景教文献、景教遗物的总结全面，解说详细，参考价值极高。133 页的附录，就是景教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留下的几乎全部足迹。

当然，佐伯的研究也有不足，比如有些中国学者就批判佐伯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文文献意思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讹；将元代景教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景教的一夫一妻制等。但这些缺陷，只是玉石中的瑕疵，不能掩盖佐伯对景教研究的贡献。

本篇论文因材料的限制与笔者精力有限，对佐伯景教以外的研究没能涉及到，如佐伯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罗马法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笔者希望以后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使佐伯好郎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附录：佐伯好郎年谱

明治四年—1871年（0岁）

• 8月1日 生于日本广岛县佐伯郡廿日市町廿日市廿七番地。父亲佐伯友七（天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母亲トヨ<toyo>（明石氏嘉永四年九月九日生），长男。

廿日市位于广岛市西南，面向广岛湾，面积四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一万九千五十人。自古以来港口繁荣。盛行造酒、制造产业。

佐伯家在三百年前就因经营造酒业而广为人知。祖父幸次郎孩童时代就被大家称为神童，三岁时就在芸州藩主浅野长茂面前写了“太山”二字而受到表扬。祖父长时间在江户游学，却终究继承了家业，没能走上学者之路。父亲友七年幼时也喜好读书，也有一段时间滞留在江户，还追随父亲幸次郎到长崎游学，但最终还是继承了家业。

但是，祖父、父亲在当时都是少有的博学多才之士。这样的家庭背景，给佐伯好郎带来了深刻影响。

• 8月18日 设置了东京、大阪、镇西（熊本）、东北（仙台）四镇台。

明治六年—1873年（两岁）

• 2月24日 取消了全国耶稣教禁止令。

明治九年—1876年（五岁）

• 4月5日 进入廿日市“修业堂”小学。（十一月改称为“廿日市小学校”）

明治十年—1877年（六岁）

• 4月12日 东京大学创立。设立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开设大学预备校（后来的一高）。

明治十四年—1881年（十岁）

• 1月7日 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创立。

• 10月12日 颁布于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的诏书。听了班主任满田省三郎关于此事的演说深受启发，立志要当国会议员。

明治十五年—1882年（十一岁）

• 6月10日 廿日市小学毕业。

• 9月10日 入佐伯汉文学校学习汉文。

• 10月21日 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创立。

明治十八年—1885年（十四岁）

• 3月1日 在佐伯汉文学校的谷本节夫、广岛县士族奥董作的门下学习英文，同时在广岛县士族金子琢章、寺田清十郎门下学习汉学，直到明治二十年七月末为止。

• 同月 因为同年八月天皇要来廿日市，当时的佐伯郡长山口光风命令郡内的村长和小学校长，物色侍奉明治天皇的少年。被选中。此后每日进出郡长室，在寺田清十郎门下学习礼法直到七月末。

• 7月 英吉利法律学校（后来的中央大学）创立。

- 8月1日 亲眼目睹明治天皇和文武百官的威仪。受到当时大书记官金井之恭的激励。
 - 冬 高井与四郎开设英语私塾“应新义塾”。立即入学，在高井和河内一郎的门下学习英语。
- 明治十九年—1886年（十五岁）

- 3月2日 帝国大学令公布，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
- 夏 中山米吉（后来的农业大臣）由广岛县府中町出身的山田一郎陪伴来到廿日市的田原荣旧宅，两人劝佐伯上京读书。尤其是山田一郎送给他《东洋小野辛先生传》，勉励佐伯当政治家，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 10月20日 英国汽船诺尔曼号在纪州冲沉没。外籍乘客全部获救，而日本人却被弃置船舱内全部遇难。被称为国耻“诺尔曼号事件”。

明治二十年—1887年（十六岁）

- 春 立志上京读书，偷偷将“东京游学的必要”一文献给父亲看，得到父亲的同意。
- 8月 获准三年期限上京。徒步到广岛，坐小船到宇品、坐蒸气船到神户、横滨、最后坐火车到达东京。经同乡友人越智修吉的帮忙住到早稻田町四九小川。同宿的有长谷川定（后来的名古屋控诉院长）、宫崎八重吉（作家、湖处子）。
- 9月1日 搬到神田锦町，与正木义太同宿。入英吉利法律学校。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十七岁）

- 7月10日 英吉利法律学校第一年级结束。
- 8月1日 英吉利法律学校退学，直到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自学政治、法律、经济以及欧洲各国史，同时在神田今川小路的“讲英义塾”的宫崎嘉国门下学习英语。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十八岁）

-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
- 秋 第二次国内博览会在上野公园举行。同乡前辈八田谨二郎上京。拜访八田谨二郎，谈论天下形势，劝八田参加贵族院议员候补，约定若当选就为他当秘书。

八田氏是广岛县有名的富豪。由于受到八田家的信任和支持，佐伯好郎的青年时代才得以更加多姿多彩。

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十九岁）

- 2月—3月 参加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编入考试。搬到鹤卷町的寄宿屋。
- 4月 成为东京专门学校司法科三年后期唯一通过编入考试的人。
- 7月1日 东京专门学校司法科毕业。
- 7月1日 召开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在贵族院议员选举中失败的八田谨二郎当选。
- 9月1日 入东京专门学校英语文学科。
- 10月 跟随八田代议士上京，作为秘书住在八田家。
- 秋 在筑地圣保罗教会受洗于三上九满三牧师。
- 11月29日 观看第一次帝国议会开院式。这时开始作为八田代议士的秘书管理财政，也在这时清楚看到政界权钱交易关系。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二十岁）

- 1月9日 第一高等中学校英语讲师内村鑑三的所谓“不敬事件”发生。
- 1月 与政党领袖的接触依然频繁，渐渐对政界感到了失望。
- 2月 东京专门学校英语文学科退学。
- 4月21日 看到内村鑑三的妻子加寿子冷清的葬礼，非常同情，下决心以后要帮助内村鑑三。
- 10月18日 早朝、美浓尾张地区发生大地震（死者9700余人），东京驻地圣保罗教会集合教会青年信徒组成了罹难者救援队，作为队长参加。这次活动成为日本最初的救援运动。

而且在此时对偶然相遇的罹难老女人表示出了强烈的同情，为救济老女人作娼妓的儿媳而奔走。虽然没能得到成功，但这一活动成为日本娼妓解放运动的开端。此时与他的想法产生共鸣，挺身废娼运动而成为名律师的就是岩崎义宪（后来的岳父）。

- 9月开始到第二年一月的五个月期间，从英国人J·威廉以及H·哈密尔顿博士、理学士鲍尔那里学习英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的基础。

- 12月15日 最初的众议院解散。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二十二岁）

- 4月25日 在横滨港乘上驶往美国的轮船。
- 9月 进入北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私立学校，学习历史、希腊、拉丁语，尤其在希腊语的学习中表现突出，平均得到97分，因而得以免交六个月的学费。
- 年末 佐伯汉文学校改名为“佐伯高等小学校”。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二十三岁）

- 7月 东上来到密歇根，学习雄辩法、希伯来语基础。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二十四岁）

- 6月1日 赴加拿大多伦多市学习英语的博言学研究，直到十二月。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二十五岁）

- 2月25日 归国
- 6月8日 与岩崎义宪的长女キク <kiku>结婚。
- 12月1日 受东京专门学校的委托，在该校教授英语以及英文学。

明治三十年—1897年（二十六岁）

- 4月9日 成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本校以及附属寻常中学校英语讲师。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二十八岁）

- 4月5日 在《东京独立杂志》上发表文章“英语自学上的注意点”。
- 9月 受内村鑑三的委托当上了女子独立学校教务长，协助内村经营学校。
- 9月30日 辞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本校以及附属寻常学校英语科讲师的职务。
- 11月24日 与内村鑑三的关系决裂，《东京独立杂志》解散。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二十九岁）

- 4月20日 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讲师。
- 5月3日 兼任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英语讲师。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三十二岁）

• 1月12日 上午三点十分，第一任妻子去世（二十七岁）。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三十三岁）

• 6月3日 与第二任妻子となみ<tonami>结婚。

第二任妻子毕业于同志社女学校专门部，而后，长期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同女学校任教。才华横溢，据说英语会话方面甚至胜过佐伯好郎。

明治四十年—1907年（三十六岁）

• 9月 法政大学出版英文译本《日本刑法》。

• 这一年 在文学博士喜田贞吉的推荐下，在其主宰的杂志《地理历史》上发表“拂菻考”。这是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最初尝试。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三十七岁）

• 1月 在《地理杂志》第一百号发表“论太秦（禹豆麻佐）”。

• 1月 辞去法政大学讲师职务。

• 3月9日 从东京出发，4月4日在神户乘船，经由中国、印度、埃及到达欧洲。

在英国出入牛津、剑桥两所大学，讲演人种问题，还得以拜见爱德华七世以及皇后、皇太子。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三十八岁）

• 1月 与金井寿道一起作为日本圣公会代表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圣公会世界大会。

会议上发表了在日本建设神学校的必要性，感动了大会，全场一致地决定将资金捐给日本。用这笔资金在池袋建设了圣公会神学院。

• 10月 前往德国、法国、荷兰以及俄罗斯，视察各国的教育、社会制度。

• 11月10日 担任早稻田大学以及早稻田实业学校讲师，担当历史、英文学以及英语作文。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四十岁）

• 12月13日 待漏书院发行、三省堂出版《景教碑文研究》。

由于此书的出版愈发得到大隈重信的器重。

大正二年—1913年（四十二岁）

• 9月10日 被任命为第五高等学校教授。

大正三年—1914年（四十三岁）

• 2月6日 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府中学校教谕，单身前往台湾。

大正四年—1915年（四十四岁）

• 4月17日 为纪念德川家康去世三百周年在台湾新公园作题为“欧洲人眼中的德川家康”的讲演。

• 4月19日 在医学校讲堂作题为“德川家康与威廉·亚当的关系”的讲演。

• 发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the Educational work is Formosa”。

• 伦敦的S·P·C·K出版《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这是在牛津大学教授塞思的强烈怂恿下写成的。此书的出版，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很快就欧洲确立了佐伯好郎作为景教研究专家的声望。

大正五年—1916年（四十五岁）

- 11月10日 被任命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讲师。

大正六年—1917年（四十六岁）

- 9月6日 大阪铁商组合为了解除美国的钢铁输出禁止令而上京。作为翻译伴随他们访问美国领事馆，提出陈情书。

因这一姻缘后来成了“日美船铁交换同盟会”的事务局长。

大正七年—1918年（四十七岁）

- 为了支持欧洲战争中联合国一方，创刊了《战事时报社》。

大正八年—1919年（四十八岁）

- 6月20日 达到预期目的《战事时报社》停刊。

大正九年—1920年（四十九岁）

- 6月4日 被任命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教授。
- 9月27日 日美船铁交换的交换船引渡结束。
- 12月 为了表彰在欧洲大战上的功劳，英国皇帝乔治五世授佐伯好郎 O·B·E 勋章。

大正十年—1921年（五十岁）

- 1月13日 被任命兼任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生总监。
- 11月14日 文部省下达中国出差指令。

大正十一年—1922年（五十一岁）

- 1月10日 大隈重信侯爵去世。
- 春 在中国考察
- 9月1日 受文部大臣认可，被任命为明治大学法学部讲师，在该大学担当罗马法讲座。

大正十二年—1923年（五十二岁）

- 9月1日 上午十一点五十八分，发生关东大地震。（死者九万一千八百零二人、失踪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人）为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复兴不分昼夜奔走。
- 9月11日 作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生总监与毕业生、有志学生一起奔走的结果，在巢鸭建立了学生宿舍，这就是藏前高工学生宿舍的开始。

大正十三年—1924年（五十三岁）

- 4月21日 举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迁往大冈山的庆祝仪式。

为了此次搬迁与土地委员五岛庆太展开了多方交涉，在交涉遇到困难时得到在日美船铁交换时得到过援助的子爵泽荣一、台湾银行总裁中川小十郎的帮助，最终使谈判有利于学校一方。在这期间，台湾银行在无担保的情况下给佐伯个人一百万日元的贷款。

- 5月20日 《藏前自治》第八十一号上发表文章“复兴的精神”。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26年（五十五岁）

- 6月18日 接到文部省指令，去中国出差。

昭和二年—1927年（五十六岁）

- 12月8日 昭文堂出版《罗马法纲要》。

昭和四年—1929年（五十八岁）

• 7月1日 大东文化协会的机关杂志《大东文化》第六卷第七号发表文章“欧美人的中国研究”。

昭和六年—1931年（六十岁）

• 5月10日 受命去满州。七月中旬从东京出发，九月末回国。途中，路径北京西郊周口店到达房山，在旧十字寺发现雕刻有叙利亚文诗篇和句子的大理石碑。在英文《北京导报》上发表发现谈，北京政府将大理石碑运往故宫博物院保管展览。

在北京期间，经常与旧友陈垣（辅仁大学校长）、钱稻孙（清华大学教授，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张星良（清华大学教授）、付新年、徐鸿宝（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袁同礼（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会面交换意见。在归途中与在塘沽坐同一艘船的罗振玉一直谈论到大连。

- 11月7日 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作题为“关于中国景教”的演讲。
- 11月15日 被任命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景教研究”。
- 12月8日 在《东方学报》东京第三册上发表论文“大秦寺所在位置”。
- 12月 出版《关于中国景教》。

昭和七年—1932年（六十一岁）

- 9月13日 待漏书院出版《元主忽必烈派往欧洲的景教僧的旅行志》。
- 12月20日 春秋社出版《景教文献及遗物目录》。

昭和八年—1933年（六十二岁）

- 2月1日 《宗教研究》第十卷第二号发表“景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6月15日 《宝云》第二年第二册发表“关于中国绥远县出土的万字十字架徽章”。
- 11月20日 《东方学报》东京第四册发表“关于北京宫城午门楼发现的叙利亚古抄本”。

昭和九年—1934年（六十三岁）

- 2月5日 东京中央广播局播放演讲“欧美人的中国研究”。
- 3月10日 国民文库发行会出版《在欧美越来越旺盛的中国学》。
- 12月15日 《东方学报》东京第五册发表“吕祖全书考”。

昭和十年—1935年（六十四岁）

- 5月 《景教之研究》完成。接着从事《元明清三朝的支那基督教》的研究。
- 7月1日 明治大学法学会《法律论丛》第十四卷第七号发表《涉外亲族权诸问题》（上）。
- 8月1日 明治大学法学会《法律论丛》第十四卷第八号发表《涉外亲族权诸问题》（下）。
- 11月28日 东方研究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景教之研究》。

昭和十一年—1936年（六十五岁）

- 2月11日 《东方学报》东京第六册发表“隐藏在汉字里的外来语问题”。
- 5月1日 《史学杂志》第五册登载岸边茂雄关于《景教研究》的书评。
- 5月7日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第三次东方文化讲演会上作题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所引发的典礼问题的过去与现在”的讲演。
- 5月10日 朝日新闻登载矢吹庆辉的《景教之研究》书评。

- 东京日日新闻登载德富苏峯的书评《关于景教研究》。

昭和十二年—1937年（六十六岁）

- 6月20日 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The Nestorian Documents Relics in China》。

昭和十四年—1939年（六十八岁）

- 1月30日 《东方学报》东京第九册发表论文“谈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出土的景教遗迹”。

昭和十五年—1940年（六十九岁）

- 3月12日 《东方学报》东京第十一册上发表论文“再谈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出土的景教遗迹”。

- 5月1日 《元明清三朝的支那基督教研究》脱稿。

- 7月11日 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退休。被任命为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

昭和十六年—1941年（七十岁）

- 1月24日 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 1月27日 《帝大新闻》上登载题为“七十一岁高龄文学博士、东方文化的佐伯好郎氏”的文章。

• 1月28日 《都新闻》上登载题为“基督教新博士”的文章，《东京日日报》上登载题为“七十一岁高龄文博、支那景教研究”的文章。

- 1月29日 《读卖新闻》登载题为“苦节四十年研究、古稀翁成博士”的文章。

- 2月1日 《基督教新闻》登载题为“景教研究三十八年、终获文博桂冠”的文章。

- 5月6日 收成濑钦治·好子夫妻为养子。

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十一岁）

- 6月1日 《基督教新闻》登载题为“呕心沥血之大业—罗马法翻译完成”的文章。

- 6月9日 《景教之研究》受财团法人国民学术协会的表彰。

昭和十八年—1943年（七十二岁）

- 5月1日 成为帝国学士院终身会员。

- 6月 成为丁酉伦理会会员。

- 7月20日 春秋社出版《支那基督教研究》(1)。

- 10月21日 《朝日新闻》登载石桥致信的书评“佐伯好郎著《支那基督教研究》第一卷”。

- 12月30日 春秋社出版《支那基督教研究》(2)。

昭和十九年—1944年（七十三岁）

- 3月1日 《蒙古》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题为“关于满蒙基督教”的论文。

- 3月30日 辞去明治大学教授职务，回到故乡。

- 8月 立志中国古典的英译，开始为其作准备。

- 8月23日 春秋社出版《支那基督教研究》(3)。

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十四岁）

- 4月 当选为广岛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

- 4月14日 东京空袭开始，在东京的住所西大久保的房屋全部烧毁，藏书与家居都化为乌有。

- 8月6日 广岛原子弹爆发。（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发）。

• 8月15日 广播播放天皇的录音“终战诏书”。

• 12月28日 春秋社清明文库出版《马克·波罗的〈东方见闻录〉》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七十五岁）

• 4月1日 在廿日市创刊的俳句杂志《回廊》上发表“廿日市附近的金石文”。一直持续到第八号。

佐伯不仅将此论文作为乡土史的一部分，还打算将其作为自传的一部分，因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文章中的一些词句遭到美国进驻军的猜忌而瞬间失去了热情，未能完成。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七十六岁）

• 5月1日 《回廊》上发表“严岛文化与弘法大师”。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七十七岁）

• 3月 完成景教新文献《小岛文书A·B》的解说。（作为附录收录了《清朝基督教研究》）

• 4月5日 公选为廿日市町长。

• 8月6日 原爆纪念日上起草英文的《和平宣言》，博得世界有识之士的称赞。

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七十八岁）

• 3月20日 春秋社出版《清朝基督教研究》。

• 4月 在广岛县警察学校发表题为“民主主义和警察”的演说。

• 7月27日 六年以后再去东京，查看战争遗迹。

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七十九岁）

• 6月6日 看望卧病而无人照料的理学博士三上义夫。当时随行的《中国新闻》记者所写的文章第二天发表在本报，题为“访谈老博士卷”。

• 11月3日 获得“中国文化奖”。

• 11月11日 《中国中央报》登载文章“闪耀在中国文化奖中的佐伯好郎”。

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八十岁）

• 4月5日 第二期公选再一次当选为廿日市町长。

• 6月16日 《晚报每日新闻》登有“说起病只是装病——学究町长佐伯好郎”的记事。

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八十二岁）

• 11月15日 《早稻田学报》第七卷第九号发表文章“追忆六十年前的恩师”。

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八十三岁）

• 4月5日 第三期公选当选为廿日市町长。

• 6月20日 印刷发布“回顾廿日市町制实施以来十五年的足迹”。

• 11月12日 在大阪大学召开的日本法制史研究会上进行讲演。

昭和三十年—1955年（八十四岁）

• 5月14日 到达京都。从十六日到二十日在同志社大学内的《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研究室》讲演“景教在中国衰亡史”。

• 5月24日 到达东京，与旧时教授过的学生石黑忠荐、今村信吉一起访问同是旧时学生、已为首相的鸺山一郎。成为各报晚报、广播争相报道的新闻。

- 5月24日 早晨五点，第二任妻子去世。
- 9月9日 《哈佛·燕京·同志社文化讲座》第七号出版“景教在中国衰亡史”。

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八十五岁）

- 1月1日 《中央大学学报》第十九卷第一号发表文章“回顾中央大学七十周年所走过的路”。
- 5月19日 成为《广岛YMCA小讲堂新筑落成纪念连续文化公演会》的讲师。分五次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进行演讲。

当时所演讲的题目分别如下：

- 第一回 5月19日（星期六） 英语传来史。
- 第二回 5月26日（星期六） 基督教传来故事。
- 第三回 6月2日（星期六） 话说基督教各宗派。
- 第四回 6月9日（星期六） 论基督教与各分派。
- 第五回 6月12日（星期六） “基督”、“弥撒”的意思，以及关于这两个词的日语、中文问题。

- 9月29日 町村合并，辞去町长职务。
- 9月30日 成为廿日市町长职务执行。（11月10日辞去此职务）

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八十六岁）

- 4月27日 在京都美国文化协会针对关西亚洲学会的英美人演讲。
- 5月26日 在京都停留一天，二十七日到达东京。二十九日参加文部省学术局研究会。
- 10月20日 上京参加母校早稻田大学创立七十五周年纪念会，当晚，出席了在大隈讲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 10月21日 出席早稻田大学创立七十五周年纪念典礼。
- 12月15日 《早稻田学报》第十一卷第十号上发表文章“随想”
- 12月20日 春秋社出版《罗马帝国基督教保护规定研究》。

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八十七岁）

- 1月1日 昭和戊戌元旦迎马龄八十八有感
送岁迎年荆棘中 八十七岁如一梦 独欢劣才世无绩 尚抱壮图心太雄
- 3月12日 《每日新闻》报道“在清贫中默默耕耘的五十四年——老博士可喜的出版”。
- 3月17日 《中国新闻》报道“罗马与基督教——佐伯好郎老博士说出半世纪的成果”。
- 在春秋社社长的鼓动下，开始执笔《自传》，未完成。
- 11月15日 《早稻田学报》第十二卷第九号上发表文章“我的健康法”。

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八十八岁）

- 6月26日 到和歌山大学讲演。在和歌山大学谷口教授的陪伴下登上了高野山。终于圆了明治四十四年以来的愿望，一睹景教模型碑。

灵峰高野路峥嵘 千百余年成圣城 老翁参旨泊草堂 梦闻佛法僧之声

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八十九岁）

- 9月 杂志《道》掲載“回顾基督教在日本的历史”。

- 10月 举行早稻田大学创立八十周年庆祝仪式。
- 12月 《道》掲載“罗马法学思想对基督教成立的影响”。

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九十岁）

- 2月1日 辞去广岛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的职务，成为名誉理事。
- 3月 《道》掲載“经由日本以及三韩的原始基督教”。
- 6月 在《France-Asie》发表“The Christiamn mission beyond the Roman Empire”。
- 9月 《道》掲載“圆珍的入唐旅行”。

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九十一岁）

- 1月1日 在发往各地的贺年卡上写了题为“壬寅元旦有感”的诗。
送岁迎年荆棘中 慨欢劣才世无功 独喜遐龄九十一 依然致学寸心忠
- 10月20日 被授予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早大的名誉学位是世界上的第七人，在日本是石桥湛山、松村谦三后的第三人。
- 11月3日 各报争相报道“佐伯好郎成为早大名誉法学博士”。
- 11月10日 下午六点，在广岛市小町《见真讲堂》上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列席者包括早稻田大学总长大浜信泉、大学关系者等百余人。

学位授予仪式的惯例是在大隈讲堂举行，但考虑到佐伯好郎的年龄，特意选择了在佐伯的故乡举行。

- 11月11日 各报争相报道“总长亲自前往——为佐伯氏授予名誉学位”。

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九十二岁）

- 1月5日 《朝日新闻》报道“景教研究家佐伯好郎——坚持信念——在进一步琉球史的研究”。
- 1月30日 《中国新闻》报道佐伯好郎与广岛大学金堀教授的对话录“横跨三个时代的老学究的心胸”。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九十三岁）

- 5月5日 《每日英文》上发表“Was Kyoto Founded By Persians?”。
- 5月30日 《中国新闻》报道“在学问和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热情的佐伯好郎”。

昭和四十年—1965年（九十四岁）

- 4月29日 被授予勋三等瑞宝章。
- 6月26日 零点二十分，因肺炎并发症去世。

参考文献

- 1、(日)法本义弘主编,《佐伯好郎遗稿并传》(上、下),大空社,1996年7月27日。
- 2、(日)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大空社,1996年9月28日。
- 3、(日)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名著普及会,1980年第三版。
- 4、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
- 5、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 6、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5月。
- 7、翁绍军 校勘并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
- 8、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
- 9、冯成钧,《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三月(1999年3月)。
- 10、向达,《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五编27),上海书店,1996。
- 11、向达,《唐代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12、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
- 13、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
- 14、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5、梁鸿飞、赵跃飞,《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6、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三联书店,1995年。
- 17、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论文:

- 1、刘振宁,《唐代景教“格义”规律探析》,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06.01。
- 2、张绪山,《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
- 3、孙景尧,《成在此,败在此: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4、林悟殊,《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 5、王绍峰,《〈汉语景教文典诠释〉指谬》,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
- 6、张晓华,《佛教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比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 7、耿,《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景教碑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后记

作为一个上大学才开始真正学用中文的朝鲜族学生，回想起四年的研究生生活有过很多的艰辛，若没有身边众人的关怀与帮助，我很可能走不到今天。

首先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孙景尧先生，面对刚开始连简单的中文表述都无法流利进行的我，老师没有失望，而是加倍地关心、细心地指导我的学业。促使我努力提高中文基础知识，努力赶上同学们的步伐，虽自知与其他同学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我还是庆幸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

之所以选择写景教，写佐伯好郎，是因为导师给我看了佐伯好郎写的《景教碑文研究》，我从这本书里受到了启发。《景教碑文研究》是现居住在日本的邹纯芝师姐寄送给导师的，在这里，也要对师姐表示深深的谢意。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孙景尧先生对我论文大到主要观点、布局谋篇、小到标点使用、错别字校对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仔细的指导。

同时还要感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郑克鲁、黄铁池、朱宪生、刘文荣等导师，他们的渊博学识和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论文资料的收集方面，除了感谢邹纯芝师姐，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日本朋友竹崎由希子小姐、野崎直道先生。是他们在百忙之中不顾辛劳为我找寻资料、并给我寄送过来。

此外，我还要感谢在生活上关心我、爱护我的师母，热情温和的师母总是像母亲一样温暖着我的心；还有在经济上支持我、精神上给予极大鼓励的姐姐；孤身一人在东瀛手足无措时伸出援助之手的邹纯芝师姐、竹崎由希子小姐、野崎直道先生。

李银子

2004年4月